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社會思想史

(五)

鮑莊茄德斯著
徐卓英顧潤卿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想會社

(五)

鮑 茄 德 斯 著
徐 草 英 願 潤 卿 譯

譯世界名著

第十一章 心理社會學的思想(續)

一九〇二年庫勒教授的人類與社會制度(*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這部著作刊行問世了。這本書立即被大家所歡迎而認為是討論個人自我和社會過程二者關係的權威著作。稍後在一九〇九年他復發表了社會組織(*Social Organization*)，一九一八年又發表了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這三部書對於心理社會學思想的邏輯系統，敘述了一個歷史的發展。

第一部是討論自我對於團體生活之反應。第二部解釋原始團體的性質。例如家庭、娛樂團體和鄰里鄉黨等團體，並且解釋民治心理和社會階級的性質。第三部分析社會過程中許多要素。這些要素是表現社會特徵的。這三部書的主要論旨即是個人與社會是同一現象的兩面觀，個人和社會是雙生的(*twinborn*)並且是相並發展的(*twin-developed*)。(註一)

個人是不能單獨生存的。他一生中受着社會各方面事物之影響，是不可分離地緊繫於社會中。（註二）他不能認為是可離羣索居，甚至稱作個人一己的現象，也常常是有社會意義的。只要我們認識了這些現象是表現普通社會生活所形成的趨勢時，即可以得此結論。（註三）所謂個人形成社會，固是不錯的，然而社會形成個人，也是同樣真實的。

庫勒教授很好地申述了所謂鏡中自我（the looking-glass self）的現象。在這種現象中有三種顯著的心理要素：（一）一個人的表現在他人心目中的想像；（二）別人想像地估量那種表現；（三）自己驕傲或憤怒時的感覺。鏡中自我影響各個人的日常生活。我們在正直人的面前，似乎覺得慚愧，在勇敢者的面前似乎覺得怯懦。在文雅者的面前，覺得粗魯，以及尚有同樣的情形。（註四）甚至一個人對於他自己的感覺，也大都是他所相信別人對他的意見和批評之直接反映。

（註五）

庫勒教授對於自我意識、社會意識和公衆意識有一個很清楚的區別。第一種是我想及我自己的感象；第二種是我想及他人的感象；第三種是對於自我作綜合的觀感，並且他也是團體各分

子相組織和相溝通而形成的社會意識。(註六)再者，這三種意識是有機全體的三部分。甚至人們的道德生活也是社會有機統一體的一部分。社會知識是道德的基礎。向上的努力是道德進步的本質。

庫勒教授所稱爲主要的三種團體，是因爲個人藉着這三種團體，即獲得他的最初和最完全的社會統一體的經驗。(註七)家庭、遊戲團體和鄰里鄉黨，籠罩了全部的生活有如經驗的基礎，由此可以解釋比較複雜的生活情形。

庫勒教授對於人性有一個無限的信仰。他認爲人性是包含一些情操和衝動，很顯然地，這些情操和衝動是勝於高等動物的情操與衝動，比如同情、慈愛、憤怒、野心和是非之感覺是動物所不及的。(註八)照庫勒教授的意見，社會之改進，不在乎人性方面須有什麼主要的變遷，乃在乎『擴大地和高尚地應用人性上的顯著衝動。(註九)』

在庫勒教授的社會思想系統中，社交(communication)是一個基本概念。社交是人類關係藉以存在和發展的要素。(註一〇)庫勒教授指示：不僅語言是構成心理的符號，並且一切的人事和

行動都是心理符號。社交是心理藉以發展真正人性的一種過程。我們的社會環境的各種符號供給刺激和形式以促進我們的一切發展。因此社交這個概念是用以了解心理社會現象的真實基礎，而這些心理社會現象即是普通所稱呼的暗示和模仿。

人格之起源半由於遺傳，半由於社交關係，此二者都從種族團體生活發生出來的。研究社交的作用即將表明個人的心理並不是孤單獨自生長的，乃是一般心理所完成發展的。(註一二)

社交的途徑到了十九世紀即特別發達，其主要情形有下列諸方面：（一）表現力增大，即是說，適於傳播的觀念和感情很發達；（二）社會人事的記錄，趨於永久化；（三）交通方法迅速化了；（四）各階級的人民互相融合。(註一三)因此，社會之組織即能建築於知識理性和善感的基礎之上，而不會建築於權勢貴族和世閥之上。

觀念之自由交換並不產生一致性。自我的感情將找尋大機會以圖表現。社會交通的程度增加了，使各個人能够感覺自己對於社會全體之改進，應負重大的責任。反之，社會交通過於自由發達，也易於產生『時代病』，即是出現放縱、工作過勞、長期苦悶以及人們未有充分準備的競爭現

象(註一三)

照庫勒教授的意見，輿論不僅是各個人意見的集合，而且是社交和互相影響的融合產物。(註一四)牠是各種意見之結晶，結果成爲相當固定的思想，牠是由討論而產生的。從有力量方面來說，輿論通常是比社會各分子的普通意見更佔優勢的。

羣衆之於輿論，有基本的資助，這不是由於通行的觀念，乃是由於他們的情操。在他的日常經驗中，羣衆是接近於突現的人性。他們並不爲成見所煩擾而致妨礙他們間的友誼。他們也不會被那種注意所拘囿而致限制於亟謀私有財產之積蓄，這種私產足以妨礙有錢的人與公共生活的事物相接觸。(註一五)

社會過程的重要結果，即是人格之發展。社會過程供給一些機會，各個人在適當刺激境況之下，即可接受這些機會。教育擔負了一種很有效的任務，使個人與機會相適合。然而教育有時常流於失敗，因爲牠命令太多而鼓勵的作用太少；牠着重機械的知識而沒有去把握精神。

社會階層 (social stratification) 是有妨礙的。(註一六)牠阻滯人們之社交。牠使社會權力流

於少數活動分子之手中。而大多數人則浸沈於昏昧無知的池沼中。忽視鄰里鄉黨之聯絡，父母惡劣之行爲，輕視種族間的結合——凡此種種均足以產生社會階層以及妨礙進步。

庫勒教授主張：在社會過程中，制度這種東西和人一樣，同是重要的。（註一七）制度將過去的標準文物，傳於人們；制度使社會固定化。同時即使加以理性的控制，而那些制度，也會遺棄一些活動力不用以謀新發展。個人強健的體魄精力，常常使他不滿意於制度。有氣魄的人們，反抗制度的形式主義，由此即產生社會瓦解的現象，這種情形可視為個人與制度間缺乏溝通作用的原故。形式主義只代表在某些特殊事象，流於過度的溝通。

經濟價值的概念老早已從個人的立場加以分析了——經濟慾望是從莫測高深的個人心理中發生出來的。對於這種解釋，庫勒教授有如此的答覆：經濟的慾望、利益和價值，其源起大都是屬於制度方面的；牠們是由社會而產生的。金錢的計較大都是團體情形和團體活動的產物。

在理性的公衆意志中，庫勒教授看見了社會過程的上進。當他再三申述對於現在這種人性非常相信時，他即期待在將來總有一天，社交和教育將使一切的人們能够大大地操持人類生活，

並且根據這種操持，能够表達有實效的社會目的。不自覺的適應將代之以各個團體縝密周詳的自治自主，順着擴大的同情心和超卓的智力之途徑而進行。

庫勒教授博得了一個健全的清明的和深刻的社會學思想家之頭銜。他對於社會思想的貢獻，表現於他對於社會過程（人格和社會組織是從這種過程產生出來的）的明白敍述中，表現於他對於社會的銳敏分析中（視這種社交為進步的基本原素，）並且也表現於他着重用社會標準以進行合理的控制之態度中。

麥獨格

一九〇八年在社會心理學的思想史上是一個紀念年。在這一年中刊行出兩種重要的著作，一種是麥獨格 (W. McDougall) 著的，另一種是洛斯 (Ross) 著的。前者是從心理學立場發揮的；後者是從社會學觀點發揮的。

麥獨格把社會心理學大體看作個人的社會本能之研究；洛斯教授則注意於社會生活之暗

示及模仿的各方面。所以在一種意義上，洛斯教授開始分析的地方，正是麥獨格結論的地方。

麥獨格認本能是社會生活之基礎。他看待這些本能幾乎是一切人們活動和社會活動的根據。(註一八)本能是生理遺傳的；個人並不能把牠們歸於消滅。本能構成那些養成習慣的材料。只有當到本能或習慣（改形的本能）不足以適應人類需要時，纔會出現意識。

主要本能是兩性的、父母的、合羣的、好奇的、逃避的、抗拒的等本能。各個本能都伴有牠的特殊情緒；例如逃避的本能即伴有一種恐懼的情緒，好奇的本能即伴有一種好奇心的情緒。雖然，這種本能情緒的學說 (instinct-emotion theory) 推論到極點，即似乎流於學究式的而不甚真實的。

麥獨格教授指出本能是一切社會制度所根據的基本原素。(註一九)例如兩性本能和父母本能是家庭的基礎；求得的本能是積蓄物質財富的主要條件，並且是私有財產制度興起之主要條件。而好鬪本能則引起戰爭。

在特洛頭 (Trotter) 所著的《和平與戰爭中的羣衆本能》(Instincts of the Herd in Peace and War) 一書中，對於本能之着重算是達到了極端的形式。在此書中，認為羣衆的本能是駕乎

一切之上的。照特洛頭的意見，羣衆的本能引起個人的恐懼心，並藉着嚴厲的習慣方法（大部分對他不利的）以支配個人。

和他的本能說相關連的，麥獨格也發揮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概念，這即是情操 (*sentiments*)。情操的三種主要表現，即是愛、恨、敬。同情被視為基本情操，事實上是被視為最簡單形式的情緒。情操是情緒趨勢集中於某個對象的有組織的系統。情操是包含一個重要方面的自我，並且對於決定社會行動，是有很大力量的作用。

洛斯

一九〇一年，洛斯教授，對於社會心理學的思想上，已有創始的貢獻——這是在他發表社會心理學這部書前七年的事。他的第一部大著是社會制裁 (*Social Control*)。在這部書的附註中，他對於社會心理學的定義，認為牠是研究人類及其環境社會二者間的心理交互作用。（註二〇）這種交互作用是兩重的：社會支配個人（社會優勢）和個人控制社會（個人優勢）。社會優勢可

以是無意的（社會影響）或者也可以是有意的（社會制裁）。照洛斯教授的意見，社會心理學是討論心理的常態和趨勢，牠並不討論團體，牠乃是心理社會學的一部份的領域。

社會心理的支配根據，即基乎同情心、社會性、公道意識等要素，並且特別是基乎團體之需要。有些人的行為往往觸犯團體羣衆，在這種公衆憤怒和公衆要求報復的情形中，即潛伏了對這種人加以社會制裁的動機。（註二二）

洛斯教授討論社會制裁的最出色的地方，大概即是他分析制裁的機關這方面。（註二三）輿論和法律是制裁個人的兩個最重要的方法。然而這兩種方法，前者的弱點即是時作時輒不能經常維持；後者的弱點即是過於機械嚴厲。人們的信仰和理想有很大的作用，這是由於他們主觀性的原故。一個人也許可以逃出法律的干預；他也能避免輿論的指摘；但是他不能避免自己的觀念和良心上的不安。因此原故，宗教信條是很有大勢力的。藝術是一種社會制裁的方法，但普通總是被忽視。牠足以激起情感，把握同情，創生美妙完善社會象徵物之感覺。（註二三）

社會制裁的制度是政治的或者是道德的。（註二十四）制裁的政治形式多少是有點客觀的，牠易

流於少數人之手，並且易於利用以謀階級之福利。制裁的倫理形式，是從情操方面發生的，而不甚是由功利方面發生的。牠多少是有點主觀的；在個人空間獨居的生活，也會發生倫理的意識。這種倫理體系，常常是溫和的、啓迪的和文雅的，而不甚是勇敢的和威嚴的。各個人通常都知道政治之制裁，但是他們卻幾乎不會顧慮倫理制裁的大影響。

關於社會制裁社會所要解決的困難問題有二，這即是（一）那些制裁力的方法可以用之而無弊害；（二）如何應用這些制裁方法。（註二五）社會所應用的各種懲戒法，是酌量情節而變異的，從名譽申斥以至大辟之刑都會採用的。這些懲戒法之變化，從社會審判的平民化的處置，以至於專制政治的直接處置。過分的制裁不是產生社會停滯即產生社會革命，這是有賴於社會各階級分子所具有的力量之多少以爲轉移。過於微弱的制裁易流於紊亂狀態，至少將走到自私自利的情形中。父權的社會制裁也許引起個人的憤恨或喪失自尊的。

暗示或模仿是社會的要素，這是洛斯教授所已經詳細敍述過的。（註二六）他說明：比較富於合羣性的種族，是更富於暗示的，而多少有點離羣索居性的人們，是比較不甚富於暗示的；南方民族

比較北方民族更富於暗示性；而兒童比成人又更適於暗示的，這是因為兒童所擁有的事實不多，以及所賦有而未發展的批評力不大；神經質的人們，比較冷靜性的人們，更可以暗示的，這是因他感覺力不相同的原故；婦女比較男子是富於暗示性的，因為她們沒有像男子一樣享受着外界很廣大的影響力，比如高等教育、旅行、自治動作、職業選擇、參與理智的和公衆的生活。（註二七）

|塔德最初所略舉的模仿律（特別是時尚模仿律和理性模仿律，）洛斯教授曾加以解釋和說明。洛斯很勇敢地拋棄時尚、風俗習慣諸方面的虛飾事象，而極力辯護在這幾方面的理性。他表明暴民心理，和狂妄熱烈的舉動如何地不僅掃蕩了昏昧輕浮的人們並且也排斥神志清楚富於感覺性的人們。事實上，他已表白得很清楚：甚至頭腦最清晰的人們也常常盲目地或者俯首帖耳地受支配於風俗或時尚或此二者，然而他卻沒有主張模仿是同類意識和公共社會刺激之結果。他認為暗示模仿現象之起源，與其說是團體，寧可說是個人的。

洛斯教授認為人們對於事物之互相討論，可以透露着進步的一線主要希望。（註二八）討論足以與領袖人物相衝突，以及引起團體進步。討論是會轉變個人的意見。適當的討論，足以解決衝突

以及產生固定的輿論，這種輿論發生效力，直到新發明出現為止；因此，新衝突隨之而起，新輿論也發生權力。

一九二〇年，洛斯教授對於社會思想，有一個最偉大最重要的貢獻，這即是他的社會學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雖然，這部著作可以說大部分是社會心理學上的論文。最基本原始的社會是人類性向——本能。（註二九）隨之而來的社會力即是易於滿足本能要求的社會複合事象（societal complexes）。洛斯教授對於派生的社會力（或興趣）認為大概可類分為四種。這些基本的興趣即是財富的、政治的、宗教的和知識的這四種。這種類分，只包含兩種或者最多三種興趣，是司馬爾教授陳述的六種興趣中所具有的。

洛斯教授關於社會化過程的分析已經陳述於第二十一章。這種現象是要很清楚地與社會生活嚴格形式相區別。（註三〇）團體往往變成不適當的凝固化。這種情形之得超度，在乎社會分化，使社會全體分割為許多微小部分，並放縱社會各分子之行動。（註三一）發展人們自由精神的任何運動，都易於引起社會分化。

社會商業化是使任何職業或職務受制於謀利的動機。(註三二)抑止謀利動機的要素，即是：(一)創造活動的愉快；(二)完成自己的作品之驕傲心；(三)要求依照業已公認的優越標準而生活的慾望；(四)對於虛偽工作之厭惡；(五)謀他人福利的興趣；(六)社會服務的動機。雖然，謀利的動機也得着許多社會趨勢來支持，其顯著者為：(一)生活者和消費者的距離漸次增加；(二)上層人物和下層人物二者日趨分化；(三)資本這種東西在事業或職業之進行中，日趨重要。

洛斯教授發表了一些有價值的社會改造之原則。(註三三)(一)改革方案不要干犯了人性。(二)那些方案須與社會主要實際情形相符合。(三)在未有計劃那些方案之前，應當先親切地研究所要改變的事象。(四)改革方案在未大規模採用之前，應當先作小規模的嘗試。(五)改革方案應當是社會運動之產物。(六)在平民政府之下，改革方案應當依照法律手續和憲政方法而進行。

關於社會制度的改進，洛斯教授的理論根據於生活標準之要義。他說：『生活標準大概是社

會中最重要的事物。」（註三四）這種東西雖然是視而不見，觸而無感，但是牠們卻更適宜於啓示社會的性質。

流行的家庭標準，可以用許多方法來改良，比如傳播健全的婚姻理想，確定這些理想於社會傳說中，使社會風氣輕視那些昏昧的和無價值的婚姻理想。（註三五）少年人可以好好地教以慎重離婚，視之為道德的敗壞，對於國家或社會的忠心，其源起在於兒童服從父母。因此，洛斯教授視健全的家庭生活為社會的保障。

關於工業，他指示蘇維埃原則完全是與布希札維克主義（Bolshevism）偶然地聯絡。（註三六）根據蘇維埃本身的成績，牠是可以博得好批評的。然而公民用以互相團結，以求保持在政治上的代表權之原則，則尚未得成立。對於施行人民在政治上的代表制度，以地理區域為單位，是否優於以職業分劃為單位呢？這是尚未得到解答的。

洛斯教授是反對國家社會主義的；他認為這種國家社會主義使公民離棄他自己的有生機的業務（即是自己經營工業）過於遙遠了，以致於他每年投票選舉這種動作，只成為一種游戲

的事情，他差不多只是國家的一個奴隸。（註三七）在另一方面，基爾特社會主義則主張各種工業之組織其本身應將是民主化，國家之組織不要以省區或地方為自治單位，而須使工業能運用相當的自治權。洛斯贊成現在所出現的一般改變，即是從強迫的工業生活轉變到自願服務的工業生活。

洛斯教授推論了幾個重要的社會學的普通原則。這些原則他稱之為期望的原則、刺激的原則、個人化的原則和均勢的原則。所謂期望的原則，他是指大家知道的一種制度之進行策略，為某些分子所期待其實行，並且其結果將轉變人們的行為。（註三八）人們往往根據這種原則以謀不正當的利益。例如兒童依賴恩愛與仁慈。乞丐的虛偽哀訴常常是有效的。關於這方面，真正的社會改良，大不同於普通的慈善概念，因為社會改良的方法，是使人們適於前進，廓清他們的道路，鼓舞他們作生活上之賽跑。（註三九）至於後者（慈善）則不足以資助永久的價值。

刺激的原則，即是指通常有一種趨勢利用無價值的事物，刺激人們，炫惑耳目以博社會之贊同，由此以沽名釣譽。（註四〇）商業競爭往往流於賣假貨、冒牌商業。有一種職業上的競賣技者，他們

有時假充是真實謀體格發展的熱心家。一般政客也往往是專門的欺騙家。

個人化的原則即是指給個人以一適宜的發展機會。社會既是日益複雜，制度既趨於漸次僵化，以及生活既然更加標準化，所以普通人即漸次有受傷害的危險；至少他的自我表現的機會，將漸次減少。在教育上，須有經常的注意，使各個人有特殊的表現；在工業上，需要保障勞工使其人格表現於其工作中；在政治上須允許大家能自由討論。

|洛斯教授所陳述的均勢原則即是：『在社會前進的過程中，各個社會分子應當依照他們的智力和公衆精神而享受一切，不應當有人特別佔優勢。』（註四一）有一種悲慘的爭鬭出現於階級之間。要求某一階級支配其他各階級，這種情形古時曾經有過，並且就是現在也還出現於各國中。由此社會感受無限的痛苦，社會往往受犧牲於死者之統治、男性主義之統治、僧侶之統治、驕武主義之統治、商業主義之統治、法治主義之統治、有閒階級之統治，總之凡此現象都是一個階級把握政權，支配弱者階級，直到弱者階級獲得強力，足以推翻當權階級為止。

|洛斯教授的社會心理學的思想，通過了人類生活的最深處。牠是表現於清明有力的文字中。

牠喚起各地有社會思想人們的注意。牠確定了社會學的領域，貢獻了心理學的接近法。

瓦拉斯

現在我們且來特別注意到像瓦拉斯(Wallace)所用過的『大社會』(The Great Society)這個概念。大社會是對於現代人類社會稱呼的名字，牠是機械發明、工業生產、商業發達、民主進化的產物——高級的組織和複雜錯綜的關係。大體說來，這種社會是被那些握有無限的社會權力而不用以謀社會福利的人們所統治，並且這種社會的構成分子，大都是那些對於社會權力認識不清的人們以及一些往往以不信任和厭惡的態度對待社會的人們。(註四二)

瓦拉斯認『組織』(代替他人的有機體)是基本的社會概念。他區分思想的組織、意志的組織和幸福的組織。所謂思想的組織，即是社會中那些使思想得以發展的制度，例如各種討論的團體，從哲學研究會以迄通常從事計劃的各種委員會，都屬此類。關於此點，瓦拉斯申述他曾經出席過大概三千次各種組織各種目的的市政委員會議，並且他認定至少有一半到會的男女，完全

不知覺自己所爲何事以及應當如何努力。(註四三)他們到會與許多到教堂中的精神是相同的，即是大家認爲他們之出席，只是盡自己的責任，並且由此或者可以得到某種利益。

關於意志的組織則是由於不完善的社會機關而出現的。在工業方面，有三種意志的組織是在積極的表現中——私產制度，個人主義者爲之代表；國家，集體主義者爲之代表；勞工組織，大概可以工團主義者爲之代表。在各國中，亟須要發明一種方法，以調劑其中個人間和階級間的衝突，^參這種調劑法之發明，比較任何單純原則（無論是代表制、財產制或職業制）都更有效的。

(註四四)

對於幸福的組織則尙進行未遠。事事求效率已排擠了求幸福的意念，而以效率爲近代之神。賺錢發財的觀念蒙蔽了使人們幸福的理想。根據幸福所組織的社會制度，足以免除過貧與過富的現象，應用中庸之道爲標準以表現一切社會利益以及同樣地發揮各個人的一切能力，並且可避免一切事物中的極端現象。(註四五)

愛爾烏德

愛爾烏德(Elwood)的著作是特別根據心理學說以討論社會學的思想。愛爾烏德教授認為社會是『藉着心理交互作用以經營共同生活之人羣。』(註四六)心理交互作用之結果，即影響各分子的活動之互相調和與互相適應。

社會交互作用的心理基礎即見於個人的自動本能、情緒、意識、心向這些特質中。有機體是賦有一種無外界原因的顯著幫助而得自發種種運動。(註四七)雖然，有機體也大大地有賴於環境以發展其潛伏的能力，但是開始活動的主要基礎，則存在於牠內部的有機需要中。本能是天然選擇的產物，牠是代表那種適應過去生活需要的業已完成的神經作用。情緒也是遺傳的，牠是感情和感覺的複雜體。慾望則是感情和衝突的複合；與慾望相伴而來的，即是對於足以滿足衝動的對象之知覺。(註四八)意識之發展是用以解決本能所不能應付的問題。其初，意識是具有選擇作用的活動。然而稍後，牠則發展而為高度的複雜作用以應付人生和宇宙的各種問題。心向是社會生活過

程的產物。牠是從社會聯絡境況之下發生出來的。

有一個最基本的社會聯絡過程，這即是社交，人羣集合在一個地方，以便共同動作，這種需要即發生互相交通的種種符號。

米德 (Mead) 教授澈底討論了社會、語言和意義之覺識。^(註四九)他開始注意於人們的動作，互相刺激互相反應底社會情況。比如所謂生活乃是一組動作，刺激反應，和應付反應而產生的刺激——這些活動即構成具有意義的姿勢或符號。符號以及了解符號的意義之覺識，是社會中的主要成分。

愛爾烏德教授說：社交是在相區別而又互相作用的各個人中，推進普通生活過程的一種方法。^(註五〇)這個定義似乎是不適當地着重個人。無疑的，個人乃是社會生活大潮中的產物。暗示是一種基本的（但是倏忽間的）社交形式，牠多少有關於同情的情緒作用。模仿是傳播動作與觀念的普通機關。語言文字的社會交通，是促使社會變遷的主要因素。

華德認爲初民是反社會的，這種主張爲愛爾烏德教授所拒絕，愛爾烏德指明照社會人類學

來說，所謂初民的反社會特徵，在野蠻人中並未完全發達，然而在稍後的人民中，卻更有這種反社會的行爲。不過我們只可以這樣說，初民的社會性是很狹小的，大都限於家庭和小團體中。（註五二）愛爾烏德教授的社會變遷說，是有兩種特質：無意的和有意的——前者是低級社會進化的特質，而後者則為高級社會進化之特質。（註五三）無意的不自覺的社會變遷之形式有許多。

天然選擇易於使較弱的分子和較弱的團體受壓迫和受摧殘，另一種的無意的社會變遷則由於某些文化元素之漸次廢棄而發生的。某一代的人們並不見得能够把前輩人的一切特殊事物都完全仿學保留下來。尚有一種無意識的社會變遷即是各個人的關係發生變化，這是由於人口增加，新物質環境，新文化接觸，新發見或新發明而產生的事實上。愛爾烏德教授陳述一切社會變遷之起點都是無意識的不自覺的。（註五三）

有意識的社會變遷，其起始即由於一個人或許多人感覺某種社會風俗習慣不適宜。藉着社會的過程，這種感覺即傳播到大家。討論遂繼之而起。其初，討論大都是對於不滿意的社會情況加以批評。社會中無益有害的事物首先為人們所注意。討論既然進行了，牠即具有比較近於建設的

性質，即是說，牠變成建議的、有計劃的、積極的。牠暗示正待進行的變遷。牠轉變而成爲多少有點固定的輿論，要求有一種代替舊事物的新途徑。助長有意改變之主要原素即是自由社交、自由批評、自由討論、易於轉變輿論、自由選擇社會政策和社會領袖。（註五四）有意的社會變遷中之選擇過程即是輿論，輿論之作用即在介紹由某一種社會風習變遷到別一種風習。

西洋文明中的有意的社會變遷，一方面爲過度的個人主義所危害，他方面也受着那種壓制個人創造力的和輕視心理德性的社會主義所恐嚇。愛爾烏德教授極力申述教育之重要，教育須使個人社會化，同時須發展高尚的人性。

社會既不能使其風俗制度維持高度的適應性，則在此變態的社會境況之下，也發生社會變遷。（註五五）專制獨裁者，資產階級，僧侶階級，特權團體，一般人的知識停滯無進步，這些情形都是易於阻滯制度之適應性。如果這種適應性沒有了，則社會境況即將產生革命。如果統治階級濫用大權力，使一些反對者的生命，隨意被摧殘，則革命將無定地延展時期。如果社會中精明分子的能力，大受阻撓，無積極表現的機會，則他們即不滿意於現狀而成爲反叛之主動力。如果革命來到了，則

社會組織中許多有價值的事物也將隨無價值的事物同歸消滅，混戰盛行，因此，社會生活之流入於野蠻殘酷的階段，是很容易有可能性的。

|愛爾烏德教授在他的社會問題討論中，指示前次世界大戰的好結果，被我們社會中那些特殊階級的盲目自私所摧殘了，被非特權階級的某些人物的過激主義所危害了。（註五六）使現今世界不得安全地實現民治主義的壓力，即是各個的帝國主義、商業主義，追求物質的生活階級衝突，宗教的不可知論，以及輕視婚姻與家庭的態度。（註五七）從某方面來說，社會問題即是訓練人民能够公平合作共同生活的問題。

照堵哥所指示的，避免社會革命的唯一途徑即是用適當而良好的社會改革。現今最迫切需要的社會改革有三方面：以大公無私的國際主義代替自私的國家主義，以精神文明代替流行的物慾生活，以及將自私自尊的民族，改變為社會化的民族。促進這三種改變是一件大任務，是唯一的社會問題。

文明是社會價值的複合物。愛爾烏德教授對於價值之分類，大不同於瞿丁斯教授的分析

(見前一章)照愛爾烏德教授的意見，西方文明可用下列這幾類的社會價值(這是歷史產物)來代表：(一)精神的和倫理的價值，——古代希伯來人所敘述的；(二)希臘人所發揮的美學與哲學之概念；(三)羅馬人所創倡的政治組織與法制形式；(四)初期條頓民族所表現的人類自由的信仰；(五)文藝復興時代所起源的科學精神與技術；(六)工業革命所發生的經濟效率；(七)廣泛的人道主義的價值——這是十九世紀的產物。雖然，這種廣大而複雜的西方文明是需要從牠的結構方面，除去極端的個人主義、物慾主義和自私的國家主義這三個業已腐蝕的柱木，而一代之以精神化的和社會化的事物。

人性是最可改變的東西，這是我們知道的。普通人類的行為是一種不固定的混合物，所以把牠的構成要件改變了，則行為本身即會發生變化的。「利用科學，人類即將能够漸次了解大自然以及支配自己的行為」這是愛爾烏德陳述於人類社會心理學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Society) 這部書中的信仰，這本著作包含著者過去曾經發表的許多心理觀點之修改和成熟底敍述。(註五八)

海斯

照海斯(Hayes)教授的分析，社會制裁的性質是要使人類的優良經驗得以完全的和諧的實現。(註五九)社會制裁應當禁止那些不合乎理性的活動，應當鼓勵那些合乎理性的活動，所謂不合理性，即是用活動本身的內在價值及其效果來判斷。關於社會制裁的目的，這種說法，和別些人對於這方面的解釋很相似。

社會制裁有二種：第一種即是賞罰的制裁，第二種則是社會暗示的制裁。社會賞罰即是對於善者予以獎賞對於惡者予以懲罰。雖然，海斯教授並不以法律為社會秩序的最後基礎。乃是以人格為社會秩序的最後基礎。對於罪犯加以遏制固是正當的方法，然而這卻是低級的，並非勸善規過提高人們的道德心之舉動。社會制裁的唯一問題，即在乎選擇各個人（當他是在幼年時）的本能趨勢，並使那些本能趨勢有一種好傾向而表現下列四種特徵：（一）忠厚誠實；（二）有節制的飲食動作等等動物性；（三）堅毅耐勞；（四）社會精神或社會公道。(註六〇)

海斯教授關於社會制裁方法之陳述在意趣方面有似於洛斯教授所建議的綱目。教育被視為社會制裁最重要的方法。教育能够左右人們努力的方向；教育能够轉變關於社會評價的注重點。海斯教授承認遺傳之重要，以及認識個人之成就是如何地比較更有賴於遺傳而不甚有賴於努力之方針。雖然，社會也大有權力以決定其中那種人物能够盡量把他們的先天能力充分發展，並且社會也有權力以決定其中各分子活動所應採取的方向。(註六一)

在社會制裁的教育任務中，家庭是佔有首要的位置。(註六二)家庭養成人格的力量，足以與其他諸方法連合的作用相比擬。做母親這種職業，在社會上，比較其他任何職業都更重要。

韋伯倫

企業的、有閒階級的、機器過程的、工業和工作的社會心理學會由韋伯倫(Veblen)加以申述。韋氏精銳獨到的著作表現於幾部書籍中，其主要者是有閒階級論(*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企業論(*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以及工作本能(*Instinct of Workmanship*)。

最能表述韋伯倫的觀念的，要算是他的『諸原則』(canons)。

金錢競爭的原則 (canon of pecuniary emulation) 描寫某些人不停的努力，以求在財富擁有上勝過別人。(註六三) 這種財富之擁有，被認為是對於擁有者足以發生莫大的光榮。金錢美麗的原則 (canon of pecuniary beauty) 是說及人們大都有一種印象，謂事物之美麗與其所花費的本錢成比例。(註六四) 金錢花費之標記被認為是美麗的象徵。

顯耀消費的原則 (canon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這個名詞是用以表述一個人很闊綽消費財物以顯示其富裕的方法。顯耀消費之表現於裝飾方面比較表現於其他任何方面都更顯見的。(註六五) 顯耀空間的原則 (canon of conspicuous Leisure) 是指某些人當其生活空閒無所事事時，即追隨這種法則而視為最足以表明經濟豐裕的方法。(註六六) 有時候，男子使其妻在娛樂室中消磨其時間以求完成自己富豪的地位。

有閒階級保守主義的原則 (canon of leisure class conservatism) 是韋伯倫標明資產階級有保守的趨勢。幸運的人兒大都是滿意於現狀。他們之反對社會變遷，因為社會革新也許會推

翻他們舒服的現狀。他們握有優越的物質利益，其他當毋論焉。

韋伯倫的金錢效率的原則(*canon of pecuniary efficiency*) 卽是指許多對於效率之見解大都着眼於價格。善於招攬主顧博得利益的人，即被視為有能力的和善為服務的。(註六七)以最小成本賺得大財富的人們，即大受鄰里親族所推重。發明家能够親手獲得十萬元的報酬，即大受讚揚。換言之，對於人們之評價有一種共同的趨勢，即是直接與其所賺得的金錢總數成比例。

好戰的原則(*canon of bellicoseness*) 卽是指有閒階級熱心於戰事。很有錢的人們，毋須努力工作以謀生活，他們即感覺時間之冗長。所以他們即去找求刺激與安慰以排遣無聊，並且向各方面去追求這些東西，特別是在戰爭這方面。

金錢教育的原則(*canon of pecuniary education*)是包括要求實用教育的趨勢；一加考察這種實用教育是資助個人將來成就事業的教育。教育所要使少年人將來追求的成功，在實際生活的人看來，即是金錢上的成功。『實用』這個字乃是有利於私人利益之謂。許多人對於教育上所予以的考察，即是教育能使一個人得以賺錢麼？這個金錢打算的原則，表明有許多職業都產

生金錢思想的習慣。就多數人來說，他們比較嚴重的思想之起點和終點都是帶有金錢意味的。機器過程思想的原則(*canon of machine process thinking*)即是近世機器之使用，產生了一種多少是根據於物質因果關係的思想。機器是不知道道德的，不知道尊嚴高貴的，也不知道正義公理的。機器過程的勞工操作於無人性的因果世界中，即有喪失罪惡觀點之危險。

韋伯倫教授極力發揮了人類工作的本能。依照這種主張，各個人要去做事、去建設、去成就去工作，這是天然的。各個人藉着活動以表現他自己，由此而獲得樂趣。每個人都是向前推進的活動之中心；他賦有要求工作有效果的嗜好。(註六八)然而勞動因不受尊重，遂令人發生厭惡。這一點應當歸咎於世襲的有閒階級。(註六九)然而使人類生活能够從禽獸界走到人類，即是由於這種工作本能。

韋伯倫對於社會思想的貢獻都是具有激動思想的性質。他的貢獻有時流於不適宜的比較，往往發生衝突，然而大體說來，那也有創見的。像上面這幾段很簡單的引證文字，對於韋伯倫嚴厲地批評社會弱點之議論，並不足予以公正的評判。

好華德

我們討論社會心理學思想之性質，若是不說到好華德（G. E. Howard）的著作，那就非完全的討論。好華德是政治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並且也是社會心理學家。關於好華德博士所藉以出名的各方面的研究，他所用的方法都是心理學的研究法。他建議了關於社會心理學領域的很優越的大綱，並附有社會心理學者的著作目錄。要討論好華德教授的社會心理學思想，其最好的方法，大概不如舉出一篇可充代表的文字，現在且用他在美國社會學會（當時他是此學會的會長）的演說辭來供我們觀察。那篇演說辭的標題爲『理想是未來國際社會制裁的要素』。這篇大作，好像是當時一九一八年社會學會年會中所宣讀的許多關於社會制裁的論文之導言一樣。這些論文（以及他的演說辭）業已彙集而爲此學會叢刊的第七卷。

所謂社會制裁，好華德教授是指佔優勢的社會意識之標準概念。（註七〇）然而在同那一卷的刊物中，寇耳西（Carl Kelsey）教授則把社會制裁解釋爲『將那些謀私利的人民與財物加以

適當的組織和利用。」（註七二）韋伯斯特（Hutton Webster）教授則傾向於相信原始社會制裁的主要特點，即是對於新事象的迷信恐懼心。（註七二）查平（F. Stuart Chapin）教授則認為原始社會有權勢的主要成分，如社會風俗習尚等，足以壓制個人。（註七三）關於社會制裁之解釋現在毋須再加引述，讀者如有興趣，可直接參考該叢刊第七卷。

關於認理想是國際制度的一種方法，好華德教授也表明：有些理想將發生惡影響的。民族國家的理想即使不是反乎道德，然而也似乎是無道德的。（註七四）對於這四種現在流行的倫理標準，即個人道德、事業道德、國家對內的道德，以及用以對待外人的國際道德之標準，其大小限度是漸次低降的，而第四種為最低國家主義過分發達了，而致於犧牲了所切要的國際主義。

有危害於社會本身的其他一種假理想，即是戰爭和讚武主義這種概念。戰爭本身即是不好的。這樣的戰爭也不是英雄的。種族的價值則構成第三種虛偽的理想，「每個民族都自以為優於其他各民族，然而每個民族都錯誤了。」（註七五）民族自誇自大是與基督教的理想相違背，並且那種自大心理，是要以各民族能力平等的新學說來代替的。

在另一方面，民治主義的理想則產生真正適於進步的需要。牠足以產生和平，雖然民治主義也必須使其自身除去那些缺點。世襲特權和階級特權，必須廢除的政治之腐化和民族之不良分子是必須消除的；婦女是原始社會建設者，是工業之母，是首先發明和平方法的人，在社會制裁中必須允許她有充分的言論。

教育理想也是非常優良的，因為牠包含了改變其他理想的過程。教育養成人民對專制政治去歌功頌德，也可以很適當地養成一般人民去建設自治的民主政治。

好華德博士很堅決地為社會理想主義而辯護——這種理想主義是最有效果的。（註七六）

『這種理想主義者是具有吸力的社會建築家，他夢想着使大都市道德化和衛生化的計劃；他籌措廓清欺騙政治之運動；他要想計擬一種法律以救濟在工廠中或店鋪中受殘暴男子管理下的兒童；他計劃要使國民同意於除去那種製造罪惡的特殊享樂場所；他思考如何去拯救貪婪的人民以及如何利用全體人民和天然財物。理想主義者是大政治家——國家之首領——他想像着一種計劃以期保障民治主義以及全世界之和平。』

心理學家關於社會心理學的討論，是開始於『個人』等他把『個人』這個概念大加發揮後，即注意於在社會關係中的個人。本能的趨勢，固定的反射等是主要的必需動作。社會心理學有一部分被視為應用心理學的表現。（註七七）

在心理學上，行為主義的運動是大有影響於社會心理學，行為的模式（神經系統，發生機械地刺激反應之作用）是有遺傳的和後獲的這兩種。無數的賦有潛力的反射作用，即構成遺傳稟賦。（註七八）

對於社會心理學思想，近來有一個綜合的陳述，這即是伯納德（L. L. Bernard）所貢獻的。（註七九）他敍述行為的有機基礎，行為模式的性質、習慣機體的性質，以及意識的機能組織之性質。人格是完成於心理社會環境影響之下。社會心理學的定義，即為『牠是研究個人與其環境（特別是心理社會之環境）相接觸後，如何發展其團體調適或社會調適的科學。』具有傳統意義的『本能』這個概念是被棄置的。這個概念之應用有好幾百種的意義，所以牠是無價值的工具；因此，伯納德教授，即主張過去所稱為『本能』的，有許多現象都是習慣養成的，並主張以環境過程

說代替本能說，這個環境過程說是根據於與客觀社會制裁的概念相聯絡的生物學公式。（註八〇）許多學者都指斥『本能』而杜威為尤著，他注重習慣，這是大家知道的。習慣與衝動在人類行為中佔有重要的作用。在社會刺激之下衝動即組織而為習慣。習慣的性質是固定的、一致的、持久的。（註八一）甚至思想也是習慣。

湯麥斯（W. I. Thomas）曾用社會態度和社會價值的名詞去分析社會過程。因此對於社會心理學的思想即給予了一種新着重。態度是用個人意識的過程，在社會界中牠決定個人實在的或可能的活動。（註八二）在另一方面，社會價值則是具有經驗內容與活動意義的任何事件。因此，活動是社會態度與社會價值二者的結合物。價值是物質的或精神的事件所具有的意義。態度是追逐價值的趨勢。社會心理學是社會態度的科學。

照帕克和柏嘉斯在他們的社會學概論所說的，社會過程通常是包含四階段：（一）競爭，或無意識的衝突；（二）鬭爭，或公開的衝突；（三）順應，或有意的適應；（四）同化，或無意的統一。社會交互作用是社會過程的起點。

本章和前一章對於心理社會學的思想史，已經介紹過了，再補助以前面社會衝突論和社會合作論那幾章的材料，由此可知心理社會學的思想在社會學的領域中，是佔有首要位置的。在社會思想上，牠將很適宜地成為中心力，並且也適宜於領導社會科學。牠討論了一些最有生機的概念，即是團體、人格、行為、衝突、合作和過程。應用這些概念，對於社會問題之了解，可以有最好的研究方法。

大社會（註八三）

『在過去一百年中，文明生活的外表情形，因為許多發明物的影響，而產生變化。這些發明物，將昔日機械力的創造、人和物的運輸、和語言文字的溝通三者所受之限制，一網打盡。社會階級的改動，是這個變化的效果之一。現在人們的工作、思想和感覺，都和環境有關。而這個環境，就牠的普遍全世界的範圍和牠對於人生各方面的密切關係而論，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

經濟學家對於這個社會階級的改動，擇定牠的一方面，在經濟學中加以研究，並且為這方面

創造一個新名字，叫做「大工業」，而研究所得全部結果，社會學家為便利起見，可以叫做大社會。在上述變化發軼的國家，大多數人民或者住在大的商業城市中，或者住在人煙稠密的工業區中。這些工業區佔地幾百平方英里，並有機械的交通工具。城市和工業區，都是組織很完密的民族國家之一部，每個國家的人口或者是五千萬，或者是一萬萬。這些國家，在國際關係上每年愈趨愈密切的。

大社會的每個會員，不論是愚蠢的或者敏慧的，不論有天生的政客或商人之廣大好奇心，或者有天生的工匠對於所見所觸事物之專心，總避不了這個愈變愈大愈變愈緊的束縛。一個人對於一個財政家，儘管從未聽到他的名字，但是這個財政家的突然之決斷，不論在什麼時候，竟能使這個人所服務的公司、礦場或者工廠，立刻倒閉，而這個人也就此無法謀生，或者不得不攜眷遷往一個新中心點。這個人和他的同事，對於本國政黨和本國或者國際商業聯合會(trade unions)所提出的難題，如果大部分能够評判適當，惟有在這個時候，他們方能維持他們的標準工資，或者維持他們地位的穩固。在「大工業」的勢力尚未達到之英國村莊，社會階級的改動，已經發現。一

個代人洗衣的寡婦，她的成功或者失敗，完全要看在六七種互相競爭的宣傳計劃之下，她選用漿粉、蘇打(soda)，或者綃衣機的技巧而決定。在草地上踢足球的孩子們，自以爲將來或者成爲英國代表隊的隊員。戴眼鏡的青年教員，那時站立一旁，念及自己將來的幸福，就想到自己在特蘭斯凡爾(Transvaal)或者澳大利亞西部(West Australia)兩處的擢升機會，或者想自己的宗教意見和德國某教授所著希伯來死後情形論之分析兩者間的關係。

英國工廠女工被迫加入工會；疲倦的老年蘇格蘭看門人，有幾英鎊的積蓄；加利西亞(Galicia)的農夫聽到了移民發起人的呼聲；法國城市的工匠，其職業受到一個新發明物的威脅；這些人都知道除非他們能够從聽到的傳來之世界時事中，自己設法前進而不受到障礙，他們一定要被打倒的。他們原欲住在熟悉的環境和親密的友人之中，但是決不敢這樣做。至於他們的子孫，生長於支加哥(Chicago)之郊外，或者生長於託頓漢(Tottenham)和密德爾斯堡(Middlesborough)的陋巷中，對於昔日的生活情形，就作爲他們願望的目的，也已經不存在了。

在全無意識的社會不平等之中，我們覺得比較的有希望。對於排列成行等待監守室開門之

犯人，或者對於馳騁於華貴的汽車中之癡肥婦人，我們能够想法應付。但是我們所想的法子，引起書記、工匠和教師數目的增加，而他們的生活狀況，并沒有重大變化。就是公園、圖畫陳列室、圖書館和新環境的其他緩和物，在其餘的時候，我們爲了牠們工作和選舉，但是牠們似乎總是非常不適宜的。

有許多人留意於東方的從舊變新之迅速變化，也說有同樣的但更加厲害的感覺。印度(Hinloo)農夫，放棄了農村的貧困和不可靠，跑到孟買紗廠求比較穩妥的工作和比較大些的工資，但自稱心靈的需要，并未因此得到更大的滿足。西曆一八九四年，日本人民開始堅決地加入「大社會」，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曾經說過：「新日本是更富饒、更強盛，並且有許多地方，是更聰敏，但是就快樂和慈善而論，則萬萬不及老日本。」

社會遺傳物(註八四)

『我們的教養，也可分做二部。第一部包括各人自己獲得而非從他人學得者。第二部包括知

識、策略和習慣；這些原是個人獲得的，但是後來利用社會過程——教學法——由一代傳給後代。我們所謂社會遺傳物，就是指教養的第二部而言。

就我們所知道的而論，社會遺傳過程，對於野生的非人的種族之生存，是非必要的。燕子或者倫敦的老鼠，倘使將從父母所學得的完全忘卻，那末牠們的數目，經過幾代，或者會減少到現在數目的一半或者四分之一。在人類中，倘使社會遺傳中途停止，那末就是最重要最進步的人種，或者要完全滅亡的。倘使地球和韋爾斯（Wells）所講的彗星之一互撞一下，倘使現在的人因此將前代遺傳下來的知識和習慣，完全忘卻，「雖然他的發明力、記憶力和馴熟力（habituatian），仍舊保存而毫無變化，」那末倫敦或者紐約的居民，在一個月之內，十分之九必定死亡，在其餘的十分之一中，百分之九十九在六個月內一定死亡。他們沒有言語可以表示他們的思想，而且除掉模糊的幻想之外，沒有思想。他們不能讀通告，不能開車騎馬。他們或者聽從幾個天生佔優勢的人們之含糊呼聲，到處遊蕩，口渴的時候，在河邊碼頭上喝水，溺死了幾百個人，或者嗅到了腐爛食物的氣味，就去搶劫那些店鋪，最後或者竟會實行食人主義。

幾年之後，南北兩溫帶的人類，差不多一定消滅。白種人或者到處滅絕。有幾個原始人種，在人類發軾的肥沃熱帶地方，或者可以賴菓子和小動物爲生，再慢慢地積成一個新的社會遺傳物。經過幾千代之後，他們或者纔有我們所謂言語、和養馴禽獸、耕種土地等方法。至於我們所謂宗教，對於我們比較簡單的機械發明物和政治手腕，他們或者已經有了，或者仍是沒有。他們雖然不會再造成「法律」或者「自由」普遍觀念；但是或者會創造其他我們視爲新奇的普遍的觀念。

自從日用言語和燧石取火術開始以來——就是說大約五十萬年以來——人類依賴社會遺傳物的程度，是逐漸加甚。這件事使我們生物學上遺傳的天性，發生重大的變動。就生物學而論，我們的生活有了社會遺傳物，是更加適宜，沒有牠就不大適宜。可以說我們人類已是寄生於社會遺傳物了。』

社會心理學的性質和範圍（註八五）

『人類的交際，產生心的常態和趨勢，研究這些常態和趨勢的科學，叫做社會心理學。社會心

理學的目的，在乎明了和解釋感覺、信仰或者意志——所以和舉動——中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是從人們間相互作用——就是社會原因——生出來的。人類的天賦，沒有兩個人是相同的。就遺傳性而論，人類的不同和特性，應該比我們所看見的更加顯著。交際的聯成一線的力量(alignment power)，打倒性情和經驗的分歧。宗教信條的數目，本應該和人類的數目一樣；但是世界人類所擁護的宗教，祇有幾個。衣服、飲食、娛樂或者道德觀念，也是這樣情形。人們從自然得到的個性，大部分被消除了，所以人們就歸入幾個有一致性的常態。

當人們的注意，從人們所信賴的一致物(agreements)——例如語言、宗教和文化——移轉到吸引人們的激動(agitators)，那末我們所用的比喻，自然要從常態一變而為趨勢了。一個羣衆，見了一個兇惡的罪犯，會一致有處死該犯之心；一個軍隊戰敗之後，兵士會一致驚惶無措；宗教情緒之傳播，罷工風潮的擴大，這些都引起趨勢觀念，而所謂趨勢，鼓動人們於一時，後來就停止了。

社會心理學和純粹社會學之不同的地方，在乎前者是研究常態和趨勢的；後者是研究團體和機構的。人們的利益，使人們或者互相合作，或者互相衝突。人們爲了合作或者奮鬥起見，分別結

成團體；又想出機構，藉此調整利益和達到實用目的。社會心理學以爲人們在這個時候，不過參加一致的常態或者趨勢，並不是聯合成爲團體。因爲前者（參加常態和趨勢）決定後者（聯合成爲團體）的力量，比後者決定前者的力量要大些，所以就研究的次序而論，應該社會心理學在前，純粹社會學在後。

社會心理學，對於人類中非心的(*non-psychic*)類似物（例如低地最初居民中之疾病的傳染，或者傷風和熱病的流行，）或者對於從這些類似物產生的心的類似物（例如憂鬱病或者對於永久的懲罰之信心，）是毫不注意的。人類中有許多一致物，是從普通的自然界環境（例如水手之迷信，戶外人們之快樂，平原居民的暗示性，山居人民的獨立精神）直接作用產生出來的，或者是由於受制於相似的生活狀況（漂泊印刷人的放蕩，牧童們的鹵莽，年長的學校教師之拘謹，農夫們的多疑）而產生的，社會心理學對於這些相似物，也完全忽視的。

直接或者間接從種族的天資——黑人的善辯，吉布西人(*Gypsy*)的流蕩，馬來人的復仇心，錫蘭人(*Singhalese*)的奸詐，馬扎兒人(*Magyar*)的愛好音樂，斯拉夫人(*Slavs*)的神祕性，條

頓人(Teutons)的冒險性，美國人民的好動性——產生的一致物，社會心理學是置若罔聞的。這些公共的性質之來源，有多少是確實屬於種族的，有多少是屬於社會的，這個問題，還待日後解決。牠們的先天性，或者比我們所想像的比較少些。許多初學者，對於任何集合的特性，或者因為生性愚笨，或者因為生性疏懶，不能或者不肯在自然環境中，在社會環境中，或者在歷史的狀況中，去招尋這個特性的來源，就拿「種族」來搪塞一下。

從社會原因——就是心智的接觸，或者心智的相互作用——產生的一致物，是社會心理學要研究的。每次我們一定要問：「這些人們是否給他們的公共的本能和性情，公共的地理位置，相似的生活狀況，或者相互心理學——就是他們間相互影響，或者從一個公共的人類來源所得到之影響——列成一線」心智的一致，伸展於全社會，使許多人參加一個公共的常態，但是這件事並不是社會的。如果這件事是從心智間相互作用產生出來的，那末牠是社會的了。

社會心理學對於感情、信仰或者目的中許多常態，說明牠們在人類中怎樣成立和怎樣供給牠們的分類、合作和衝突之根據，因此擴大了我們對於社會的認識。如果沒有許多過程，將意見、信

仰和取捨的模型灌輸給許多人們，偉大的社會是不能持久的。一個團體，除非爲社交的快樂或者合作的必要所維繫着，也是不能經久的。民族的特性不會發生，而在受到同樣特徵化的人們之外，爭鬭就此變成常事了。

社會心理學，要斷定個人的心智內容和選擇有多少是從社會環境得來的，因此擴大了我們對於個人的認識。每個人都喜歡自以爲是無比的、自立的、行動自由的。實則他的一舉一動都效法別人，但是他自以爲他走這條路因爲這條路是對的，並不是因爲這條路已經有人走過。所以古萊（Cooley）（註八六）說：「倘使一個人愈是像美國人，愈是看不出美國人的特性。」他將這個特性具體表現出來；不論在他所做的、所說的或者所寫的之中，都充滿了這個特性；但是祇因爲他沒有外在的觀察點，可以察看這個特性，所以他永遠不會看見牠。」社會心理學既然證明在我們的生活，中，毫無疑義地到處有社會要素，就督促我們推廣和建設一個真正的個性，使我們變成一個聲音，而不是一個回聲，使我們變成一個人而不是一隻鸚鵡。倘使我們知道我們對於自己今日的地位，貢獻是怎樣小，在我們的觀念中，可以稱爲我們自己的，是怎樣少，我們自己想出信仰，是絕無而僅

有我們的選擇，是怎樣不能表示我們天性的真正願望，那末這個知覺先使我們感受痛苦，後來又使我們打破風俗習慣的束縛，而過到一個接近現實的戶外生活。只有脫離了數目時代、社會特殊地位和人格的束縛，零數(ciphers)方能變成整數。

社會心理學分成兩個很不等的部分，叫做社會權力和個人權力，就是多個(the many)決定一個(the one)，和一個決定多個平常人們給他們的社會環境所甄陶，社會環境給特別人們所改變。所以武俠模範，離奇愛情的標準，威思敏士問答教授法(Westminster catechism)，和對於公共教育的信仰，都是出類拔萃的人們之事業，並且是無數平常人們的社會環境中之要素。』

個人(註八七)

『一個沒有軀殼的個人，是一個抽象的觀念，是經驗所不知道的，如果社會脫離了個人，也是這樣的。真實之物是人類的生活，這個生活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從個人的立場，另一種是從社會的（就是普通的）立場；但是這個生活，實在既是個人的，又是普通的。換一句話說，「社會」和「個人」

人」並不指可以分離的現象，不過是同一事物之集合的和個別的狀態，其間的關係，正和其他表示 (expressions) 間的關係相同；至於所謂其他表示，其中有一個代表整個的團體，另外一個代表這個團體的團員，例如軍隊和兵士、學級和學生等等。不論在那一個社會集合體——或者大的，或者小的——之中，都有這種情形；在一個家庭中，在一個城市中，在一個民族中，在一個種族中，亦然如此；就是在整個的人類中，仍是這樣；一個團體，不論怎樣廣大、複雜或者經久，我們是沒有理由可以說在這一點上，牠是和最小的、最簡單的和最不久的團體，是兩樣的。

自然，我們以爲正確的見解是這樣的：以時間而論，個性既不在交際之前，以道德而論，個性也不在交際之下；但是牠們一直並肩存在着，好像是同一事物的補充狀態，就以進步的方向而言，兩者都是各從低級種類進展到高級種類，並不是從一個進展到別一個的。』

原始人羣（註八八）

『原始人羣，在這裏是指有親密的聯合和合作之人羣而言。查這些人羣在幾個意義上，是原

始的，而最重要的是，在組成社會的性質和個人的理想中，牠們是不可少的。就心理學而論，親密的聯合之結果，是許多個性融合成爲一個公共的全體，所以一個人的自我——至少有許多人——是這個全體的公共生活和目的。我們如果要描寫這個全體，最簡單的方法，是說牠是一個「我們」；牠包含「我們」所表示的同情心和互相確認 (identification)。一個人生活於這個全體意識之中，而且在這個全體意之中，他可以達到他的意志之重要目的。

原始人羣的統一性，並不是僅僅和諧及愛好。這個統一性，是一個分歧的而且常常是競爭的統一性，牠承認自我主張和各種合宜的情緒；但是這些情緒給同情心社會化了，並且要受到公共精神的訓練。個人將變爲曖昧不明，但是他的奢望之重要目的，是在他人的思想中得到一個所要的地位，他對於服務和公正的公共標準，將發生順從心。所以一個男孩要和他的同伴互相爭奪運動隊中一個位置，但是在這個爭端之上，他仍想到他本級或者本校的公共光榮。

這個親密的聯合和合作之最重要活動範圍——雖然不是唯一的範圍——是家庭、兒童遊戲團體、四鄰、或者年長人之大衆團體 (community group)。這些範圍，是差不多普遍的，就是牠們

屬於各時代和各發展階段的；所以是人類天性和人類觀念中普遍性的重要根據。最好的合作研究，例如威斯德麥（Westermarck）和好華德（Howard）二人的研究，告訴我們，牠不特是一個普遍制度，並且在全世界不論什麼地方，牠比最初學派使我們假定的奇異風俗，更加相似。兒童喜歡結隊遊戲，年長的人們喜歡各種非正式集會，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這種聯合顯然是這個世界上培養人性的處所，而這件事不論在什麼地方或者不論在什麼時候，都是這樣的。

原始人羣所以稱爲原始的，有兩個原因：（一）這些人羣將社會統一性之最初的最完備的經驗，給與個人，（二）這些人羣的變化，不像更精緻的關係之變化同樣劇烈，牠們做成一個比較穩固的來源，而這些關係便是從這個來源產生的。這些人羣自然不能脫離更大的社會而獨立，但是有幾分反映牠的精神；例如德國家庭和德國學校，都多少含有德國讚武主義的色彩。

現在再論原始人羣：我們以爲人類天性，並不是單獨生存在個人中的東西，而是一個人羣天性（group nature），或者社會之原始狀態，就是社會心理之比較簡單的普通情形。從一方面講，人類天性超過我們天生的本能——雖然本能加入天性——從另一方面講，人類天性是不及觀念

和情操之更精緻的發展，這些觀念和情操就是做成制度的人類天性在那些簡單的親密的人羣中，發展和表示出來，這些人羣在各社會中，在家庭集團中，在遊樂場中，在四周鄰里中，大抵是相似的。在這些團體間之重要相似性中，從經驗上我們可以找到人類心理中類似觀念和情操之基礎。在這些團體中，不論牠在什麼地方，人類天性就成立了。人類天性，並不是人們生來就有的；祇有從交際人類方能得到牠，人們如果孤立，牠就消滅了。』

多元的行爲（註八九）

『在著者的窗外，有七隻麻雀，爲了爭奪一塊麵包皮，互鬭起來。當著者正在窺視的時候，一個乘機器腳踏車的警士，衝到街中，截住一輛疾馳的汽車，車上掛着藍色的旗幟，車中滿載紫羅蘭和女童。在兩分鐘內，左近的男童，羣集攏來，探詢汽車可否開往紐海文（New Haven），正好趕到參加「競技。』

根本上生命包含類此的許多事件。有生之物，繼續生活，目的在維持本身，使不消滅。有的時候，

這些生物要爭鬪起來。但是牠們的活動，並不限於奮鬥以求單純的生命。牠們的活動，在乎努力使生命擴大和充實，有意識的生命，是一個求滿足（包含社會分化）和事業的奮鬥。

生命在維持本身的時候，更使本身蕃殖，而個體生命的蕃殖，使生存競爭更為複雜和緊張。在這個競爭裏，犧牲是不可勝計的。祇有那些最「適宜的」生物——就是那些最能順應環境和最能應付危機的生物——能夠繼續生存。這就是自然淘汰。

一個生物的活動，是對於刺激物的反應，而反應就是行為。

行為的總和，就是生存競爭和事業競爭的總和。行為的大部分，包含努力應付急迫的需要。較小的——但是仍舊大的——部分，包含努力求得所希望的但非必要的滿足。其餘部分則屬於自由的消耗，使用的目的，完全出於一時高興，並不求任何效果，所以有變成實驗的趨勢，探查環境是一個例子；實驗引起發明，沒有發明，當然沒有事業可言。

在這個世界中，可以居住的地方是有限的，所以個體——不論是細胞或者生物都依賴試誤法而生存，並且探查牠們的環境——的蕃殖產生接觸，並且使有生命的個體，結成團體。

最初的和最簡單的團體之結合，是誕生附帶而來的(*an incident of birth*)。

一個生物，一生要生殖好多次，這是很普通的。牠的許多子孫，在分散之前，在形式上總是一個團體。這些子孫，對於患難和安樂，都是相共的。

所以生命的蕃殖，不特使個體的生存競爭加緊，和使生存的狀況更為複雜；並且有幾處給同類的個體全部——或者差不多全部——創造一個身體上的集體生活，而在別處則使行為複雜化和組織化，更給同類的個體全部——或者差不多全部——創造一個行為上的集體生活。

組成羣隊、衆或者團的集體生活之行為，是多元的。鼓勵行為的刺激物，不論一個或者許多，有時會得到不止一個個體的反應；例如麵包屑得到七只麻雀的反應，巡警和街車得到當地許多男孩的反應。

一個團體，受到一個公共的刺激——就是這個刺激的勢力，達到這個團體的全部——各個團員所發生的反應，或者是相類的，或者各異的。對於相同的或者相類的刺激物，相類的生物平常總是有相類的反應，例如稻田中的烏鵲，聽到鎗聲同時振翼飛去，街中的男孩，追逐於救火車之後。

多元的反應——不論是相同的或者各異的——或者是同時發生的，或者是從迅速的而至遷延的。以力而論，牠們是相等的或者是不相等的。以持續性而論，牠們也是相等的或者不相等的。不論牠們是各異的或者相同的，對抗的或者聯合的，同時發生的或者相反的，相等的或者不相等的，對於一個公共的刺激之多元反應，使嚴格的利己主義之生存競爭，成爲不可能。這個情形，在人類的事業競爭中，尤是確切不移。這種事業競爭，是一個多元競爭。

多元行爲和個體行爲是不相同的，自有牠的條件、形式和定律。

著者在少年的時候，常常沿着大路驅馴家畜，因此知道使牠們行列整齊地向前進行的祕訣，在乎著者所用的刺激物——就是揚鞭所作之噼啪聲。後來著者又辦理一所鄉村小學校，並且在校中擔任教職，因此也知道整齊的合作之祕訣，在乎所用刺激物之使人信服力。這個刺激，不論是屬於物質的、功利的或者道德的，一定要是適宜的。雖然，從這許多經驗，著者卻又知道一件事，牠的興味正和上述的一樣。牠是許多神經系中相似性（或者差異性）的職務，總是重要的，而且是可以限定的。在一羣牲畜之中，假使有二三只是蠻悍的，那末定能使牧童費盡心機。一所學校之中，倘

使有二三個驕傲的而智力發達至八歲為止的兒童，那末不論那一個教師必定用盡機敏和堅忍。上面所舉的幾個例子，並非奇事，牠們是象徵的關係。多元反應的性質（例如相似的和各異的，同時發生的或者相反的，相等的或者不相等的，）總是給兩個易變之物所決定的，這兩個易變之物，是（一）刺激的強度，和（二）互相反應的機械之相似性（或者差異性）。

多元行為是社會的心理學之主旨，社會的心理學又叫做社會學，是一種應用統計方法的科學，目的在乎（一）分析多元行為，和（二）利用易變之物——（甲）刺激，（乙）互相反應的機械之相似（不論多少）——來說明多元行為的原始、完成、區別和功用。（註九〇）

心理文化的社會（註九二）

『我們離開動物階段愈遠，那末我們研究團體生活，愈可少用純粹有機的或者生物學的方法。我們所知道的人類社會之進化，大部分是屬於文化的，而人類文化根本上是心理的。我們早已知道，人類團體中之連續性，是利用言語，將心理的模型——就是知識、觀念、標準和價值——從一

代傳給另一代，這樣維持不墜的。這些心理的模型，是從原始時代以迄今日，逐漸累積和發展的。牠們是一套歷代養成而愈變愈為複雜之內在的心理習慣。牠們也變成一套客觀的習慣和制度。所以人類的社會生活，是一個在發展中的文化，而人類的歷史，是一個在增長中的傳說。這個傳說，如果離開了牠的內容——就是具體的觀念、態度和組成一個特別文化的價值——我們是不能了解的了。

這個根據歷史和文化而研究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法，有許多人以為是和心理的方法相反的，但是這是錯誤的。就牠的構成要素而言，文化是心理學的，且一經分析到最後一步，牠是從個人心理而來的。假使我們將文化分析起來，我們就會發現其中每個要素，都是從個人心理的創造行為而來的，戈登威綏（Goldenweiser）教授實在早已說過了（見一九二四年出版之 Amer. Sch. Soc.）。但是從另一個意義來講，文化是累積的、歷史的和不屬於個人的。牠是給個人吸收了，並且調整個人的性質和行為。但是牠的傳播者，卻是團體。牠供給人類團體組織、團體行為和個人行為三者的模型。所以有許多人類團體，完全是文化的產物。雖然一般羣衆是天生的原始的團體，

而我們所知道的全部人類羣衆，是給牠們自己的文化大大的改變了。

所以研究人類社會生活的文化論和心理論——除掉心理論的基礎是比較廣大些，心理論承認社會進化是比文化進化來得更廣大些外——是並不相反的。社會生活固然給文化所改變，但是牠在文化開始以前，已經存在了，並且是文化的傳播者。社會進化有一部分是從有機進化中幾個要素——變化、遺傳和選擇——的作用而來的，倘使我們將那一部分忽略了，那末社會的過程，就變成了個人和個人間的，及個人和物質環境間的關係中之連續不斷的適應和再適應，而這些適應和再適應都是個人心理過程所造成的。社會過程是一個互相刺激所調解而成的行為過程。有許多適應，繼續生存在團體之中，就變成我們所謂團體習慣，又叫做民間習俗，後來這些習慣又變成法律、政府、宗教、道德、工業等制度。這些制度改造人類團體的生活和行為。自然和這些制度同時存在的，還有團體中思想和感覺的一致方法，從一代傳給另一代，我們叫牠團體的傳說，或者叫牠文化的內部。但是這些都需要一個連續的心理社會的過程，就是一個團體中個人間互相刺激和感應的過程。所以社會相互作用、相互刺激和感應，都是文化過程之基礎，也是人類團體的行

爲和行爲中的變化之基礎了。

所以我們如果從人類社會之文化觀察點——就是從人類社會之民間習俗、習慣法(mores)、傳說、風俗和制度等觀察點——來研究人類社會，又我們如果承認上述種種根本上是人類行爲，並且是從社會各個會員之心的生活和發展而來的，那末這個觀察點可說是根本上心理的。除非我們使我們對於人類社會的全部意見脫離了其餘公認的科學知識，這件事是免不掉的。我們不能以爲人類文化是脫離生活的其餘部分之抽象觀念。人類文化是人類團體之全部生活過程的結果。這個我們一經承認，人類社會的文化觀察點，就和心理的觀察點混合了。

本書的主張是：人類社會的心理學——就是人類團體行爲的研究——對於許多人類社會論中真理要素的綜合，供給一個科學的基礎。例如契約論和有機論中真理要素的真正綜合，全賴這心理學而成功；因爲利用團體行爲的客觀研究，這心理學引起一個更廣大的概論，而這個概論包含契約論和有機論所着重的社會生活中許多事實。人類社會生活的心理論之解釋，可於三套事實中求之：（一）有機進化給與人類之基本的特性和性情；（二）環境的影響，尤其是對於個

人柔順性格發生影響之心理社會環境；和（三）個人啓發之合成的習慣、態度和價值。

人類社會之心理學論，以爲社會是羣居產生的行爲過程。在這個行爲過程中，衝動、習慣、感覺和想像等心理要素，和這些要素在社交、模仿、暗示、同情和其他心理相互作用中的社會表現，都是重要的組成要素。這個過程，在牠的心理和物質方面，是一定聯合一致的。因爲人類團體生活，是這些心理過程所造成，所以要解釋——照科學的方法來解釋——這個生活，必須用到這些過程。換一句話來說，必須用到心理學。因此，社會之社會學論和社會之心理學論，是完全一致的。常常有人誤認心理學論爲模仿暗示論、同情論或者——著者曾經見過——契約論。科學的心理學，不特考慮人類行爲中純粹心理的要素，並且考慮生物學的過程和環境的情形。牠不特重視生物，並且重視生物的環境。所以一個理論，如果是屬於一個心理要素的——例如模仿或者同情——或者是屬於一全級心理要素的——例如本能或者智力——決不能視爲一個人類社會之科學的心理論，否則，便要自相矛盾了。社會的心理觀念，是一個特殊的觀念，既不可和這些片面的觀念相混，也不可和契約的或者有機的觀念相混。社會的心理觀念，給與有機的要素一個基本地位，正和有

機觀念一樣，但是當我們在社會進化階段上前進的時候，社會的心理觀給與心理過程一個巨大的而日趨重要的地位，這和有機觀念正是相反。社會生活之心理觀，以爲社會生活根本上是集體的行爲過程，而這個過程是從有意識的互相刺激和感應造成的，所以這個心理觀供給了綜合其他理論之基礎，自己本身也變成了社會學觀。心理觀是一個綜合的社會過程論。

人類社會生活之心理概念所有的價值，並非僅限於理論的。我們一知道人類生活是一個行為過程，我們就知道這個過程怎樣可以改變。我們知道這樣的行為過程，與其說是天生的特性之結果，再加上物質環境的影響，毋寧說是團體中各個人之心理模型的結果。我們知道這些心理模型都包含在風俗、傳說和制度之中，並且是從以前幾代傳給團體中之現在團員。這些心理模型是個人用學習方法所獲得的，所以我們如果改變學習方法，就可改變這些心理模型。社會學和心理學都表示人類的制度，是學習而得的調整。所以大部分團體行爲和更有意識的個人行爲，也是學習而得的。倘使我們能够控制學習方法，這些行爲是可以改變的。倘使我們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教授人們，假使我們能够改變原來維持制度的物質情形，並且使個人或者團體在維持這個制度而

獲得利益，那末組成制度的社會風俗或者傳說，是很容易改變的。這件事在實際上或有困難，但是在歷史裏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的實行例子，所以我們斷定人類的社會和制度生活，是非常地可以改變的，就是依照社會生存的需要而達到更合理的調整。

依照心理觀而論，改變社會生活問題，根本是一個改變大批羣衆的習慣和信仰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容易方法，是利用青年的教育。所以改變人類社會的最便利之途徑，是改變團體的心理文化環境——就是文化。欲迅速地大規模地改變團體的心理文化環境，當然是很難的，但是可以先在小的挑選的團體中實行之，而這些團體就產生新的習慣、觀念和比較大些的團體之標準。因此利用學校和教堂，我們可以操縱個人的——尤其是青年的——觀念、態度和價值。假使個人的觀念、態度和價值，能够得到合理的指導，那末比較大些的團體——或者竟是全體人類社會——之全部習慣、社會態度、風俗和制度，也當然因之而改變了。

改變人類社會問題，既然是一個改變文化問題，那末社會變化的可能性，我們是不能限定的。按照人類學，人類文化的發展，仍在初期，這是可以相信的。文明——比較高等的文化——剛在開

始當科學使我們完全認識人類心理學和社會學兩者的原則——尤其是科學創立了科學的社會學——教化的過程 (civilizing process) 就得到合理的指導，而社會的進步，也就超過現在人類以為可以達到的程度了。」

輿論的形成(註九二)

『不負責的權力，是和民主主義相反的。輿論的權力，在現代要算權力中之最大者。牠是大部分不負責的，辦理報紙，必定是資本家的企業，因此——當然還有別的原因——報紙的權力，自然和財富的權力是聯盟的。或者竟可說報紙的權力，是財富的權力之一種。倘使財富的權力吸收了報紙的權力，那末財富——牠是有各種權力的——是權力中之最大者了。

財富祇有一個勁敵，就是觀念的權力，或者觀念和情操的權力。民主主義的進步，根據於這種權力的優勢。倘使只有一個階級的觀念和情操，得到自由的適當的表現，那末觀念和情操的權力，或者要變成專制的。但是倘使各個階級都有適當的表現，這個權力決不會是專制的。的確，從自由

討論而生的觀念和情操之統治，正是民主主義的標準。倘使輿論是自由的，那末事實就變成辯論中決定勝負的要素了。

民主主義的成功，並不需要平常人們能够創作明哲的政治。倘使牠的需要是這樣的，牠或者要失敗了。牠祇要平常人們，經他人明白解釋後，能够辨別何者對於他們自己和社會是有益的。但是他們必須有人解釋。倘使民主主義要是成功的，那末解釋者既爲了大多數和全部人類的利益着想，必須有適當的溝通意見之方法。

凡根據於物質力量的各種虐政，我們已經打倒了，這是一個大進步。但是因爲溝通人們思想之途徑，是受着操縱，我們還未打倒根據於財富權力之虐政。財富權力之虐政，必須打倒，以便第三種權力——從自由討論產生的觀念和情操權力——可以佔着優勢。

人們想出自由的普遍的祕密的投票法，這是達到民主主義的大進步。有許多人以爲這就是民主主義，但是這個見解是錯誤的。除非我們要表現的輿論有自由的形成，即使輿論有自由的表現，又有什麼用處呢？所以輿論的自由形成，是發展民主主義的第二重要步驟。牠是和打倒武力虐

政同樣重要也和投票法中輿論的自由表現同樣重要。在民主主義的技術中，這個問題要是不解決，民主主義決不會成功的。

民主主義是一個社會組織，是爲了參加這個組織的全部人們之利益而想出及造成的；和爲了組織者的利益而想出及造成組織的，是完全不同的。除非受到組織影響的利益，都有自由表示之媒介，可以感動參加組織的各方面，組織者自然爲了自己利益而組織。最重要的，凡不主張特殊利益而主張全部社會的利益或者社會各個會員的利益者，應有自由的適當的溝通全部人民的思想之方法。

這是很重要的，就是溝通一般人民思想的人，不特應該包括主張特殊政策者，或者主張特殊成見者，並且應該包括主張互相衝突之利益或者意見的各方面之代表。否則，即使一個團體、羣衆、黨派之作家，能够自由溝通同派和利害相共之人們的意見，仍舊很容易將社會分成許多暴徒心理的部分。或者可以換一句話說，除掉一小部分不大有暴徒心理的個人之外，社會分成許多這種暴徒心理的部分，而這種情形是容易繼續存在的。即使全部人民能够適當地得到陳述和曲解及

不含惡意的但是偏袒的辯論、選文、事實之描寫——這些都是從一黨之領袖而來的，但對於反對黨之報紙，則說「我黨不願有此」——這個情形仍是免不掉的。輿論是從自由的公平的討論產生的，且對於民主主義的成功，是不可少的，但是用這個方法，是得不到輿論的。

民主主義的一切制度，既然應該使輿論能够形成，也應該使輿論能有自由的表示，這兩件事是同樣重要的。要達到這個目的，美國四十八州的憲法，都要修改一下。因為報紙擁有這樣偉大的權力，也應該負起同樣的責任。因為報紙顯然是公衆 (the Public) 所以應該受公衆的節制，使能得到公衆幸福。純粹的食物定律，對於心所進的和對於胃所進的，是同樣必要的和正當的。報紙既然享有溝通公衆思想之不能估價的特權，應該出代價以獲得選舉資格，這個資格能達到必要的管理，並且使報紙能够依照牠在民主主義技術中所佔之地位，而盡牠的不可少的功用。報紙獲得選舉資格之代價，不是金錢，而是「地位」(space)。不論那一種報紙，如果超過了規定的銷數，應該依照憲法修正條文，每期劃出某種大小地位，供給上次國家選舉中得到票數最多的四個政黨——如果有四個——之用。

於是四個政黨都盡力向輿論說明自己的主張。如有欺人之談，則在並行之縱行中或者在下期報紙中評發之。如有辯論，則答復之。一個本來不備反對黨報紙的人，給好奇心和對於討論之興趣所激動，就在本黨報紙中去讀自己不知道的意見。財富溝通公衆思想之專利權，就此打消。這個辦法，在報紙方面一無損失，報紙反而能够毫無所費而獲得最佳之材料。報紙的利益和銷數，要增加起來。報紙的權力，也是這樣。但是這個權力，既不擁護特殊階級的利益，也不利用偏袒的宣傳來麻醉和欺騙民衆心理。牠是主張平等待遇和自由討論的，而自由討論是民主主義的生命線。因此在自由制度的發展中，我們已經是大大的進步了。』

社會態度和價值

『倘使社會論 (social theory) 變成社會技術 (social technique) 的基礎，而去澈底解決這些問題，那末顯然地社會論一定包含和這些問題有關的兩種事實——就是社會生活之客觀的文化要素，和社會團體中各團員之主觀的特性——而這兩種事實一定要視為互相有關係的。此

刻和將來，我們要用到這些事實，所以稱牠們爲「社會價值」——或者單稱爲「價值」——和「態度。」

社會價值指一個事實，而這個事實必須有（一）社會團體可以得到的經驗，和（二）一個意義，對於這個意義，這個事實是——或者可以是——活動的目標。例如食料、器具、錢幣、詩歌、大學、神話、科學的學說等，都是社會價值。其中每一個的內容，有的是肉慾的，例如食料、錢幣和器具；有的是一部分肉慾的，一部分想像的，例如詩歌，牠的內容不特包含口講的或者筆寫的字，並且包含這些字所引起的意象，又例如大學，牠的內容包含整個的人們、房屋、物質的附屬物和代表大學的活動之意象等等之複合物；最後有的是完全想像的，例如神話中的人物或者一個科學的學說。當我們將社會價值和人類行動一起研究，社會價值的意義就顯明了。食料的意義，是指牠的最後的消耗；器具的意義，是指設計這個器具所欲做的工作；錢幣的意義，是指買賣的可能性和消費錢幣所得的快樂；詩歌的意義，是指牠所引起的情感的和知識的反應；大學的意義，是指牠的社會活動（social activities）；神話中人物的意義，是指禮拜牠的儀式和人們以爲屬於牠的舉動；科學的學說

之意義，是指觀念或者動作，依照科學能够節制經驗的可能性。所以社會價值是和自然事物 (natural things) 相反的，自然事物有一個內容，但是自然事物如果作為大自然的一部，對於人類的活動是沒有意義的，就是「無價值的」；自然事物一有了意義，就變成了社會價值了。因為社會價值可以指許多種活動而言，牠自然可以有許多意義了。

態度是指一個個人意識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的過程，這個過程決定個人在社會中的真實的或者可能的活動。例如引起消耗食料的飢餓；工人使用工具的決心；浪子耗費金錢的傾向；詩人在詩中表示出來的感觸和觀念，及讀者的同情和讚揚；制度設法來滿足的需要，及制度所引起的反應；宗教儀式所顯示的畏懼和虔敬；創造、了解或者應用一個科學學說所引起的興趣，及這些過程所包含的思想方法——這些都是態度。所以態度是社會價值的個人的配合物，而活動——不論牠採取任何形式——是兩者間的束縛物。價值是涉及活動的，因而更涉及社會，所以態度和心的狀態是有分別的。在上面所舉的例子中，關於觀念和意志，我們不得不用許多文字，這些文字原來是應用於

客觀的社會的實在物，後來脫離了實在物而變成個人心理學的名詞，牠們的目的，原來在表示態度，而非表示心理學的過程。一個心理學的過程是一個態度，這個態度本身是一個實物，注意的反省動作使牠孤立，並且須和一個個人的其他狀態一同研究。一個態度是一個心理學的過程，這個心理學的過程最初是對於社會表顯出來的，並且須和一個社會價值一同研究。個人心理學後來可以恢復心理學的過程和客觀的實在物之間的關係——就是反省所隔斷的個人心理學更可依據世界上事實所受到的束縛，來研究心理學的過程。同樣社會論後來可聯接一個個人的各種態度，更決定他的社會性質。但是決定這兩種科學所應用的方法者，仍是原來的（常常無意識地被佔的）觀察點。心理學的過程根本上永遠是一個人的狀態；態度根本上永遠是對於一個事物的態度。」

討論要目

（一）庫勒對於社會學思想的主要貢獻。

(六二)『個人不能單獨生存』這句話的意義。

(三)自我意識與社會意識的區別。

(四)『主要團體』的概念之重要性。

(五)社交的重要性。

(六)怎樣是『時代病。』

(七)公衆輿論優於個人意見。

(八)公衆輿論的貢獻。

(九)教育偶或也會失敗的理由。

(一〇)『社會階層』的弱點。

(一一)庫勒對於經濟定命論的態度。

(一二)麥獨格所主張的社會心理學之性質。

(一三)本能與社會制度的關係。

(一四) 洛斯所主張的社會心理學。

(一五) 社會優勢與個人優勢的分別。

(一六) 社會制裁的兩種最困難的問題。

(一七) 社會制裁的過與不及的弊病。

(一八) 骨幹化與個別化的關係。

(一九) 營利的動機的限制法。

(二〇) 營利的動機的促進法。

(二一) 洛斯所主張的社會改造之三原則。

(二二) 期望的原則。

(二三) 刺激的原則。

(二四) 個人化的原則。

(二五) 均衡的原則。

(二六) 大社會的概念。

(二七) 大多數的思想組織。

(二八) 三種意志的組織。

(二九) 社會的幸福組織。

(三〇) 有意識的社會變遷的來源。

(三一) 輿論的作用。

(三二) 免除社會革命的主要方法。

(三三) 社會制裁的基本問題。

(三四) 社會中最重要的職業。

(三五) 金錢競爭的原則。

(三六) 金錢美麗的原則。

(三七) 顯耀消費的原則。

(三八) 顯耀有閒的原則。

(三九) 有閒階級保守主義的原則。

(四〇) 金錢效率的原則。

(四一) 好戰的原則。

(四二) 金錢教育的原則。

(四三) 機械方法思想的原則。

(四四) 人類工作的本能。

(四五) 四種流行的倫理標準。

(四六) 好華德所陳述的社會理想主義的任務。

(四七) 「多邊行為」這名詞的意義。

(四八) 海斯所主張的輿論的組成。

(四九) 態度與價值的區別。

(五〇) 社會心理學最近的趨向。

附註

(註一) 庫勒著社會組織，一九〇九年，斯克列勃納出版，第五頁。

(註二) 庫勒著人類與社會制度，一九〇二年，斯克列勃納出版，第三頁。

(註三) 庫勒著人類與社會制度，一九〇二年，斯克列勃納出版，第五頁。

(註四) 庫勒著人類與社會制度，一九〇二年，斯克列勃納出版，第一五二頁。

(註五) 庫勒著社會組織，一九〇九年，斯克列勃納出版，第二一頁。

(註六) 庫勒著社會組織，一九〇九年，斯克列勃納出版，第一二頁。

(註七) 庫勒著社會組織，一九〇九年，斯克列勃納出版，第二六頁。

(註八) 庫勒著人類與社會制度，一九〇二年，斯克列勃納出版，第二八頁。

(註九) 庫勒著人類與社會制度，一九〇二年，斯克列勃納出版，第三七頁。

(註一〇) 庫勒著人類與社會制度，一九〇二年，斯克列勃納出版，第六一頁。

(註一一) 庫勒著人類與社會制度，一九〇二年，斯克列勃納出版，第六三頁。

(註一二) 庫勒著人類與社會制度，一九〇二年，斯克列勃納出版，第八〇頁。

(註一三)庫勒著人類與社會制度，一九〇二年，斯克列勃納出版，第一〇三頁。

(註一四)庫勒著人類與社會制度，一九〇二年，斯克列勃納出版，第一二一頁。

(註一五)庫勒著社會過程，一九一八年，斯克列勃納出版，第六八頁。

(註一六)庫勒著社會組織，一九〇九年，斯克列勃納出版，第一八章，又第二五章至第二七章。

(註一七)庫勒著社會組織，一九〇九年，斯克列勃納出版，第三二〇頁；又社會過程，第二九七頁。

(註一八)麥獨格著社會心理學概論(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一九一四年，路斯公司出版，第二三頁。

(註一九)麥獨格著社會心理學概論，一九一四年，路斯公司出版，第二六八頁、第三二二頁、第二七九頁。

(註二〇)洛斯著社會學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一九二〇年，紀元印書局出版，第三四章，又第三五章；又洛斯著社會制裁(Social Control)，一九一〇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七章，又第八章。

(註二一)洛斯著社會制裁，一九一〇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四九頁。

(註二二)洛斯著社會制裁，一九一〇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一〇章。

(註二三)洛斯著社會制裁，一九一〇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二五七頁。

(註二四)洛斯著社會制裁，一九一〇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四一一頁。

(註二五)洛斯著社會制裁，一九一〇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三一章。

(註二六)洛斯著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一九〇八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二章。

(註二七)洛斯著社會心理學，一九〇八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七〇頁；又麥獨格著社會心理學概論，一九一四年，路斯公

司出版，第四章。

- (註二八)洛斯著社會心理學，一九〇八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一八章。
- (註二九)洛斯著社會學原理，一九二〇年，紀元印書局出版，第四三頁。
- (註三〇)洛斯著社會學原理，一九二〇年，紀元印書局出版，第四二章。
- (註三一)洛斯著社會學原理，一九二〇年，紀元印書局出版，第三六章。
- (註三二)洛斯著社會學原理，一九二〇年，紀元印書局出版，第三八章。
- (註三三)洛斯著社會學原理，一九二〇年，紀元印書局出版，第五四九頁。
- (註三四)洛斯著社會心理學，一九〇八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五六四頁。
- (註三五)洛斯著社會心理學，一九〇八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五九〇頁。
- (註三六)洛斯著社會心理學，一九〇八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六二六頁。
- (註三七)洛斯著社會心理學，一九〇八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六二六頁。
- (註三八)洛斯著社會心理學，一九〇八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六三二頁。
- (註三九)洛斯著社會心理學，一九〇八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六五二頁。
- (註四〇)洛斯著社會心理學，一九〇八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六五三頁。
- (註四一)洛斯著社會心理學，一九〇八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六九三頁。
- (註四二)瓦拉斯著大社會(*The Great Society*)，一九一四年，麥梅林公司出版，第一一頁。

(註四三)瓦拉斯著大社會，一九一四年，麥梅林公司出版，第二七〇頁。

(註四四)瓦拉斯著大社會，一九一四年，麥梅林公司出版，第三一九頁。

(註四五)瓦拉斯著大社會，一九一四年，麥梅林公司出版，第三六八頁。

(註四六)愛爾烏德著社會學的心理方面(*Sociology in its Psychological Aspects*)，一九一一年，阿普勒登公司出版，第九章。

(註四七)愛爾烏德著社會學的心理方面，一九一二年，阿普勒登公司出版，第一〇〇頁。

(註四八)愛爾烏德著社會學的心理方面，一九一二年，阿普勒登公司出版，第一一七頁。

(註四九)米德著社會意識與意義的覺識(*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Meaning*)見心理學公

報(*Psychological Bulletin*)第七卷，第四〇五期。

(註五〇)愛爾烏德著社會學的心理方面，一九一二年，阿普勒登公司出版，第一五三頁；又愛爾烏德著社會心理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第一四九頁。

(註五一)愛爾烏德著社會學的心理方面，一九一二年，阿普勒登公司出版，第一三八頁。

(註五二)愛爾烏德著社會心理學概論，第一四九頁。

(註五三)愛爾烏德著社會心理學概論，第一四七頁。

(註五四)愛爾烏德著社會心理學概論，第一五一页。

(註五五)愛爾烏德著社會心理學概論，第一七〇頁。

(註五六)愛爾烏德著：社會問題 (The Social Problem)，一九一九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二頁。

(註五七)愛爾烏德著：社會問題，一九一九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四頁。

(註五八)愛爾烏德著：人類社會心理學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Society)，一九二五年，阿普勒登公司出版。

(註五九)海斯著：社會學研究概論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九一五年，阿普勒登公司出版，第

五八六頁。

(註六〇)海斯著：社會學研究概論，一九一五年，阿普勒登公司出版，第五八六頁。

(註六一)海斯著：社會學研究概論，一九一五年，阿普勒登公司出版，第六六四頁。

(註六二)海斯著：社會學研究概論，一九一五年，阿普勒登公司出版，第六六九頁。

(註六三)韋伯倫著：有閒階級論，一九一二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三一頁。

(註六四)韋伯倫著：有閒階級論，一九一二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一六九頁。

(註六五)韋伯倫著：有閒階級論，一九一二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六八頁。

(註六六)韋伯倫著：有閒階級論，一九一二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三六頁。

(註六七)韋伯倫著：人類工作本能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一九一四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三四九頁。

(註六八)韋伯倫著：有閒階級論，一九一二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一五頁。

(註六九)韋伯倫著：有閒階級論，一九一二年，麥梅林書局出版，第一七頁。

(註七〇)美國社會學會刊物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第七集，第十一頁。

(註七一)美國社會學會刊物第七集，第二七頁。

(註七二)美國社會學會刊物第七集，第五九頁。

(註七三)美國社會學會刊物第七集，第六八頁。

(註七四)美國社會學會刊物第七集，第三頁。

(註七五)美國社會學會刊物第七集，第六頁。

(註七六)美國社會學會刊物第七集，第一〇頁。

(註七七)高爾特(R. H. Gault)著社會心理學，一九二三年，好脫公司出版。

(註七八)渥爾泡(F. N. Allport)著社會心理學，一九二四年，呼登密弗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出版。

(註七九)伯納德著社會心理學概論，一九二六年，好脫公司出版。

(註八〇)伯納德著本能(Instinct)，一九二四年，好脫公司出版。『本能』這名詞的各種意義，經過了多方的研究，其所得的結果就在這部書中詳細記述。

(註八一)杜威著人類的性格與行為(Human Nature and Conduct)，一九二一年，好脫公司出版，第五八頁。

(註八二)湯麥斯和石斯基(Znaniecki)合著歐洲與美洲的波蘭農民(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一九一八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第一章，第二二節。

(註八三)特許轉錄自瓦拉斯著大社會，一九一四年，麥梅林書局出版。

(註八四)特許轉錄自瓦拉斯著我們社會的遺傳(Our Social Heritage)，一九二一年，雅魯大學出版。

(註八五)特許轉錄自洛斯著社會心理學，一九〇八年，麥梅林書局出版。

(註八六)庫勒著人類與社會制度，第三六頁。

(註八七)特許轉錄自庫勒著人類與社會制度，一九二二年，斯克列勃納出版。

(註八八)特許轉錄自庫勒著社會組織，一九〇九年，斯克列勃納出版。

(註八九)特許轉錄自吉丁斯(F. H. Giddings)著社會原理的研究(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ociety)一九一一年，麥梅林書局出版。

(註九〇)美國科學雜誌(Science)，一八九九年一月六日號，鮑茄德斯(Bogardus)譯文『社會的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Society)，會經討論到『社會的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這兩個名詞的意義是不相同的，因為前者就是與社會學相同的，而後者確與社會學不同。

(註九一)特許轉錄自愛爾烏德著社會的文化原理與心理原理(The Cultural or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Society)，美國實用社會學雜誌(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第十卷。

(註九二)特許轉錄自海斯著輿論的組成(The Formation of Public Opinion)，美國實用社會學雜誌，第十卷。

(註九三)特許轉錄自湯麥斯與石蟲基合著歐洲與美洲的波蘭農民，第一冊。

第二十四章 實用社會學的趨向

上面各章大都討論着哲學的和心理學的社會思想。此外還有一個廣大的社會學領域，就是通常稱爲實用社會學，實用社會學最先的正式定義也許是華德所擬訂的。他說：『實用社會學不是行政學、政治學或民政和社會的改革，它本身並不含有社會學的原理，而只是表示那些社會學的原理怎樣可以適於實用……它最多也不過釐定相當的原則，作爲社會的和政治的行爲的指導』（註一）純粹的社會學是討論事實、原因和原理的，但實用社會學是討論對象、結果和作用的。前者是關於社會學的本質，而後者是關於它的運用。簡言之，實用社會學是『討論那些加速自然的過程的人爲方法』（註二）。

直接研究社會問題的人們，從自己的經驗上，獲到很有價值的教訓。有些時候他們照着虛妄的學說去研究，可是時常也譏笑着整個的理論。在另一極端，大家也時常接受良好的理論，但是在

這種理想的職業上，發生很可憐的錯誤。

社會的技術論

就實用社會學的名詞的含義說，它也討論着改良人類生活的技術。最好的技術是從試驗而發展的，但是由於人們將社會學說的優點與實際活動的程序合併起來而獲到的。社會技術論的概念，也許是比較實用社會學的名詞更來得確切些，是亨德生(Charles R. Henderson)所貢獻給社會的。他有適當的思想，清醒的判斷，以及重要的改良的活動，因此成爲社會科學這一支派的創始者。亨德生對於民主主義和基督教兩方的實際解釋，刑學上勇敢而慈祥的改革精神，慈善事業上的預防的概念，以及人類事業中的公道和博愛等，都有相當的貢獻，因此他的名字與這些都有聯繫。此外還有許多重重的人物，對於建立社會技術論都有幫助。這些個人是巴納特(Canon Barnett)、道恩比(Arnold Toynbee)、利斯(Jacob Riis)、亞當斯(Jane Addams)和許多其他的社會幸福論者。

貧窮

貧窮與犯罪是社會幸福工作上有關係的兩種主要現象。在二十世紀以前，應付貧窮問題的努力大都是補救式的。耶穌說過窮人在任何時代的社會中總是有。阿西錫 (Assissi) 的聖佛蘭西斯厭倦於寺院生活的時候，就找到了各種自然生活中的窮人，獻身去謀他們的幸福。

英國經過了幾百年的實驗解決貧窮和乞丐問題的方法。她知道一旦過於賙恤窮人，就足以鼓勵乞丐化的精神，而增加依賴分子的人數。當她寬待私生子時，就足以助長非法的性交。

英國有許多重要的文學領袖，對於窮人和被棄者表示同情。狄更斯 (Dickens) 維妙維肖地描摹貧窮者的情形，破除迷信者和個人主義者加賴爾 (Carlyle) 再三的揭穿那使社會慘狀永久存在的社會黑暗。拉斯金 (Ruskin) 用美麗的文字，為社會的公道立言。同樣地，法國有蕭古 (Hugo) 和巴札克 (Balzac)；德國有霍卜特曼 (Hauptmann)；俄國有托爾斯泰 (Tolstoi) 和高爾基 (Gorky)；斯干狄那維亞有波昂生 (Bjornson)、易卜生 (Ibsen) 和斯特林堡 (Strindberg)。但是這些

個人不能算是社會技術家。他們指導了輿論注意於特殊的社會問題，而從未貢獻有實際價值的技術計劃。

一九〇〇年以後，社會技術論的領袖們，例如亨德生（註三）雪特尼（Sidney）、韋勃（Beatrice Webb）（註四）以及地凡恩（E. T. Devine）等，（註五）很明白地規定了在什麼情形之下，纔能對於窮人予以永久的援助。（註六）救濟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但施濟的方法一定要不會鼓勵任何人依賴求乞為生活。現在大家對於貧窮的思想，大都以激勵人格為標準。並且指導個人怎樣去自己調劑經濟。同時教育的過程和人格糾正的方法是受人注重了。

總之，社會的技術論主張在經濟條件之下，應該有一種公道成立起來。前面第十四章中已經敘述過，亨利喬治在他的《進步與貧窮》一書中，將貧窮的各種原因作了基本的分析，這些原因是他在經濟制度上的不公平的因素裏面找到的。他說明土地所有權是怎樣發端於強力。第一個人取得了一塊土地，將它用籬笆圍起來，不許旁人佔用，除非是付以相當代價，而這種代價又是與人口的增加一樣迅速地高漲，這情形是否可以容許呢？（註七）為什麼窮苦的一天一天更窮苦，而財富

的一天一天更財富呢？都市愈大，惡濁的程度也愈高——這是亨利喬治很迷惑的觀察。物質進步並不改善最低階級的生活情形。在現經濟制度下的繁榮，好像是一個大木楔插進社會的腰心。凡在楔尖以下的人們是被搾壓下去了，在楔尖以上的人們是愈舉愈高，而躋於奢侈富麗的地位。

亨利喬治的觀念在目前雖有很多信徒，但他認為用單稅制將土地所有權從私人手裏拿出來，就可以防止貧窮，這一點未免有些錯誤。同時，大家也不能忽視事實，就是有時地價的增高完全是由於人口加多的關係。生殖率或移民都是以加多人口和增高地價，而跟着地租就昂貴起來，生活程度也被提高了，貧窮的情形也厲害起來。

現在許多人認為貧窮是社會失掉調整的結果。有許多歷史的制度都是為了救濟貧困而發展的。特殊的依賴階級是從無家可歸的孤兒以至孑然一身的老者。救濟的機構或方法包括社會化的睦誼、社會化的教育和社會化的宗教。（註八）關於貧窮的研究現在已採取個別考察的方法。這種歸納法的科學的調查一定可以產生一種新的貧窮社會學。（註九）

關於犯罪的人類思想史，已經經過許多變遷，直到好華德(John Howard)和柏卡略(Becca-

ria) 的時代，纔有真正的科學研究法來討論這問題。好華德——西曆一七二六年至一七九〇年——是百特福特(Bedford)的警察長，對於罪犯很有研究的興趣。他參觀了全英國的監獄，他也旅行於歐洲各部，大都自己出錢，以研究傷寒症的原因，努力設法給犯罪者以更合人道的待遇。

柏卡略——西曆一七三五年至一七九四年——是意大利的犯罪學家，在一七六四年出版了一部有名的著作，就是犯罪與刑罰(Crimes and Punishment)。柏卡略反對用恐嚇的方法來遏制犯罪行為。他認為以報復的方法懲治罪犯是不妥當的動機。慘刑是不合人道的。報復和遏制兩種方法都不能應付問題。柏卡略主張改過的概念，這一點差不多使歐洲各國覺得驚異，他認為刑罰的執行是要使罪犯改過為目的。

在近代的犯罪學領域中，朗柏羅梭(Cesare Lombroso——西曆一八三六年至一九〇九年)是一位很負名望的學者。(註一〇)朗柏羅梭是定命論者，他在遺傳和環境兩方找到了犯罪的一切原因，而減除個人的道德責任。心理缺憾者、酒徒醉漢和暴躁易怒者對於自己所犯的罪是不負責任的。朗柏羅梭派將各種不負責的犯罪敘述臚舉，事實上差不多包羅一切個人的行為，都

可以自己不負責。

照朗柏羅梭一派的意見，犯罪的救濟是在乎社會。社會對於內部個人的犯罪行為是應該負責的。如果社會使個人自少及長有一個優良的環境，犯罪行為就不再發生了。加洛福羅（Garofalo）、費利（Ferri）、魁洛（de Quiros）格洛斯（Gross）和其他大陸的犯罪學者的著作中，普通都抱着比較廣泛的觀點，認為犯罪的責任應該歸咎於三種因素：就是遺傳、環境和個人道德。這些因素的區別，以及個人的責任問題，通常總是很不容易分辨的。歐洲的犯罪學專家，或甚至美國像巴美利（Parmeleo）一些學者，也將道德性的重要和個人應負的責任減輕到最低限度。

刑罰

美國各方面的注意力大都傾向於刑罰的研究。從威廉潘（William Penn）在英國被拘於監獄的時候起，美國的思想界就集中注意力於改良監獄的問題，包羅斯（Barrows）和柏洛克惠二位學者終身致力於監獄手續的改革，溫納斯（Wines）和蘭恩（Lane）對於刑學思想上也闡明

這種改良監獄的趨向，並且將柏洛克惠 (Z. R. Brockway) 的成就加以推行，而設立紐約城的安密拉感化院 (The Elmira Reformatory) (註一)

安密拉院的感化方法是根據於下面幾種基本原則：（一）普通的獄犯都可以感化的。（二）感化獄犯是國家的責任。（三）獄犯應該被視為個人，享有各人的需要，使他對於人生維持正常的态度。（四）獄犯的感化一定要他自己對於這過程加以合作。（五）監獄必須有權可以依照罪犯的感化程度，延長或減短拘禁的時間。（六）感化的整個過程是教育的，所以應該給以機會去謀心理和道德的長進。（七）懲治犯罪是要施以強迫的訓練和勞工。

近幾年來，奧斯本 (T. M. Osborne) 已經在研究着獄犯的『榮譽制度』 (Honor System) 和自治方案。(註二) 這種觀念是波力 (Burleigh) 和柏斯塔 (Bierstadt) 所著的刑罰論 (Punishment) 中已經加以描寫的。(註三) 這概念是要用溫和的管理以及仁愛的態度以感動罪犯的心靈，而收感化的效果。

最近二十年來，預防犯罪的概念已有顯著的發展。但是這種學說將問題追溯到青年時代，少

年時代、幼年時代，或甚至追溯到某一個人的出生以前的時代。由於林德叟(Judge Ben B. Lindsey)的努力而設的兒童救濟院使大家注意到普通的罪犯是在未滿二十一歲以前已經養成的了。

近來對於過失的研究有貢獻的學者，例如亞當斯、希蘭(Healy)、柏勒金列其(Breckinridge)、阿博特(Abbott)、喬治(W. R. George)、林德叟、包文夫人(Mrs. Louise de Koven Bowen)、佛勒克納(Flexner)和包爾文(Baldwin)等，大都同意於過失的原因，也就是犯罪的原因，有下述各種：

(一) 不良的家庭——其所以不良是由於疾病、貧窮、懶惰、無知識、不道德、遺棄、離婚、死亡等——是主要的原因。差不多一切的罪犯其開始時都是在家庭中倔強不悛。子女漸次對於父母不尊敬，年青人從事於新運動，以及父母不去約束子女（特別是富貴之家），這些都是應該慎重研究的趨勢。蔑視前代的經驗而一味胡作，完全不理會自制和服從等概念，專以追求娛樂為主要目的，以及毀棄一切道德與理想——這種種流行的趨勢並不是由來已久了，其結果可想而知。

(二)情感失調是過失的主要因素。反常的環境的壓迫與遺傳的偏性相結合，就產生缺憾的人格。兒童時代失於正當的教養，即易發生性情乖戾的趨勢。醫治神經錯亂的方法正在進行中，而且是了解過失的最有效果的方法。

(三)心理缺憾也時常會引起過失。心理缺憾的兒童，如果是體力充實，就很難抵抗生活上的罪惡的引誘。他或她的情慾是比較心理的克制力更為發達。關於這一層，學校是負有重大的任務，要察別心理有缺憾的兒童，使之隔離而給以特殊的教育。他們男女兩性也應該使之隔離，以免生殖同樣不健全的子女；並且他們終身都應該受教育的和制度的監督。在杜防的環境下，他們也能够為成有益社會而且快樂。

(四)社會的疎忽是過失與犯罪的第四項原因。年青人從學校出來，時常沒有適當的家庭教育和監督，以致漂流於情形錯雜的市場環境中，各種商業化的和罪惡的花樣都足以使意志薄弱和認識不清的青年墮落。

(五)社會的不公道，例如工業方面的情形，足以引起階級間的仇恨，而致造成犯罪的行為。

(六) 缺乏道德觀念和宗教意識也是很普通的犯罪原因。一種積極的道德和宗教態度足以養成健全和服從的美德，以及完善的人格。對於公衆幸福抱有深刻的、繼續不斷的和堅固的興趣，也是預防罪惡和犯法的最良方法。

關於兒童救濟院問題上，現在有一種新發展的概念，認為這些兒童救濟院所有大部分的工作是屬於學校的範圍以內的。強迫上學、兒童幸福和繼續升學這些學校部門都可以負責指導那許多在救濟院中的青年。在學校監督下的有完善組織的積極工作和遊戲活動，足以多量地減少兒童的過失。

『過失』和『犯罪』是被『行爲問題』的概念所替代了。希蘭博士的首創工作，已經運用科學的方法來解釋人格的各種問題。關於行爲問題的個人生活史和個別研究方法是將行爲的科學方面與道德方面分開來。這科學的方法是摹仿醫生的辦法，就是醫生處治疾病，不認為一種道德的現象，而是自然現象。精神病學是搜求情感失調的所在，而加以糾正——假定情感的疾病就是行爲問題的中心。

勞工

關於勞工問題，社會技術論已經有了許多顯著的貢獻。童工這名詞是說雇用未成年的兒童來工作而給以工資，但同時這些兒童就失掉心理和身體的正常發育機會了。兒童當然應該去學習工作，甚至不很喜歡的工作，但是在幼年時就離開學校，出去謀生，就會喪失正常的幼年生活，以致兒童本身和社會兩方面都受到損失。（註一四）

婦女從事於工業的問題，是因為幾百萬的婦女從家庭走到工廠裏而發生的。婦女雖則應該與男子享受同等的機會，但她們時常沒有顧到婦女在生理上是不適宜於做男子的工作的；如果她們不盡育養子女的合理責任，人種就會衰滅；如果她們忽略不去將家庭處理得好好的，那末成爲社會制度的基本的家庭就會破壞的。

關於男子方面的勞工問題，也引起了種種矛盾的意見。工業平民化的觀念是風潮的中心。社會技術學者雖讚美現代資本主義對於發展工業的促進，以及它的偉大企業在各方面都有利於

社會，但他們又認為現代的資本主義是不平民化的。社會技術論者宣稱資本主義必自行澄清一下去，否則就有另一種工業制度來替代它。資本主義也應該認識社會的變化而適應一切，不然也會被淘汰的。

工業方面的共同管理是一種發展得很快的概念。可是只有少數的雇員願意去擔負這種責任的，而更少數的雇員是能够擔負這種責任的。但這些事實是很自然的，並不足以推翻共同管理的概念。時間、經驗和實驗是共同管理能够收效的主要條件。（註一五）

現代資本主義的不公平現象是社會技術論的思想方面所時常注意的。在業務的管理上只有財富者一方是有處理的權利。至少技巧的或不技巧的工人雖是時常為業務最辛苦的分子，反而沒有這種權利。如果資本主義要證明自己並非是不平民化，那末董事會中勞資兩方都應該有代表參加。（註一六）

三方管理法是工業制度上很流行的一種思想。雇主和雇員兩方一旦互通力合作以後，他們就會聯合起來壓迫大眾和消費者。雇主方面允許增加雇員的工資，而雇員方面假定同時自己

可以獲到相當利益。也贊成增多雇主的盈利，那末大眾就不願意或徒然的發怒了。所以目前最新的主張認為任何工業的董事會或執行部必須由有關係的三方都參加，這有關係的三方就是勞工、資本家和消費的大眾。

現在一般的意見認為資本主義不能自己變為平民化，結果一定會從革命的手段中發生社會主義。如果資方對於工業的偏面統制僅僅由勞工的統制來替代，是否可以獲到好結果，很可疑問的。勞工的立場已經在演成階級的立場，而且有些時候也是武斷式的。如果社會為勞工的立場所支配，不論在那一種社會主義之下，恐怕不能保證有進步。勞工階級、資本階級和自由職業階級都應該合作地統治社會，以謀社會的幸福。

目前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想，有激進的無產階級獨裁主義以至像斯派哥(John Spargo)所提創的保守的國家社會主義。布希札維克主義是階級專政的代表。在另一方面，國家社會主義運用政府統制生利的資本和生產地租的土地這種方法，也不見就能完全保證進步人類的社會化運動纔是工業進步的一個必需的先決條件。

現在的趨勢是傾向於取消營利主義(profism)，主張這種消極的思想的人們認爲它可以消除資本主義的最壞的罪惡，推進個人社會化的教育過程。

一八八二年以後，社會保險的概念是被大家所注意。社會保險的方法是用以和緩勞工，使其在資本主義統治之下感到相當的滿足。它是由俾斯麥(Bismarck)採用到政治經濟上，以爲抵制社會主義的工具。它的發展很是迅速。但社會保險也遇着兩種挫折：(一)第一種就是它的高度發展，被資本主義認爲它是真正社會主義的先鋒。(二)第二種就是社會保險對於工人保證很多的安全，以致工人時常犧牲了自己的創作力，甚至變爲懶惰，而自己安慰着說：『我是有依靠的。』這第二種情形是暴露着社會保險的真弱點。最好是社會中的勞工階級能够有充分的機會，或被大家鼓勵，去謀年老時或變爲殘廢時的依靠。至於個人的例外情形，可以特別設法。

失業問題也引起了許多改革社會的學說。目前正在試驗中的失業保險也許還沒有摸到失業的主要原因。這種原因是很多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從個人的惰性和心理缺憾以至經濟的不公道和社會的殘酷，都是原因的所在。(註一七)現在盛行的思想主張對於個人施以更優良的教

育在勞工每日工作的時候，增加他提高自己人格的機會，發展工業的平民化和公道，以及一種完全社會化的計劃。

家庭

實用社會學正在努力解決的，還有一些問題，就是家庭、女權主義、婚姻、離婚和住居等問題。好華德教授(Professor George E. Howard)(註一八)和惠斯德麥克(Dr. Edward Westermarck)(註一九)曾經從人類的歷史上搜求家庭和婚姻制度的發展。原始人類的兩性關係已有許多人類學者加以敘述了。柯爾洪(A. W. Calhoun)曾經撰著了一部美國家庭的歷史。(註二〇)伯山克(Bosanquet)(註二一)和古特賽(Goodsell)(註二二)兩位學者也都將家庭成爲社會制度的問題，著爲專書來討論。這些作品在根本上大都同意認爲家庭是進化的產物；原始的家庭是以母子的關係爲中心的；父權主義盛行後就增高於男子的獨斷性；以及家庭制度目前正在變化，而男女平權的精神也一天一天發展起來。

在這種新發現的自由精神中，婦女有時候很想跟男子擔任一切男子所有的工作。性的關係決定了婦女應該充任的主要職業，就是做母親的工作。婦女隨了男子衝進工業界，也許得不着自由，只是放縱和墮落罷了。現代的社會思想極力反對女子專在家中操作的觀念，也反對婦女們浪費時間去裝飾或終日在閨中偷懶，而同時成爲男子的依賴者。女子也應該學習職業，並且度着建設的生活，以適應高度自由的精神，合乎她們自己與種族的發展。在另一方面，任何運動如果要減弱家庭爲社會訓練的制度的地位，就是蔑視社會進步的定律。

建設家庭的科學基礎的運動，已經注意到家庭的預算問題。恩格斯是這種研究的創導者，他的研究至今還是很重要的。恩格斯對於家庭預算的研究，使他獲到了一些平均的觀察。這些平均現象普通稱爲恩格斯定律，例如（一）進款愈小，食用物的百分率愈大。（二）衣服和房租的費用之百分比率直接隨着進款的大小而變更。（三）進款愈大，各項雜用費（包括奢侈品在內）的百分率也愈大。

住所的問題引起了迫切的研究。大都市繁興以後，一般的經濟制度就助長了土地價格的暴

漲，以及地租的猛進。社會的利益流到少數人的手中，狹小的公寓生活使大家除了養隻喇叭狗玩玩以外，不敢生育子女；這樣生活就使家庭成爲社會制度的效率之減低了。這種乖戾的趨勢以外，大衆又是抱着漠不關心的態度。

實用社會學思想的另一方面，就是由種族問題、移民和入籍等名詞所指示的。這些概念是本書前面所討論的人口問題中產生出來的。人類的種族是共同發源的，漸次分化和流散到地球上一切可以居住的地方。氣候、地理和社會環境等都影響於各種種族的區分，使它顯著而互相差異。種族傲性和偏見就發生了牢不可破的種族隔閡了。

社會研究正從新的方面去討論種族問題。種族研究正在考察各種種族不同的和生活標準不同的人民怎樣很難——也許不可能——參加個人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社會，互相競爭和合作，而不發生衝突，這一個問題，上述的社會就是指一個沒有階級或閥閱的分別，不致限制自由競爭的社會。這裏所說的競爭是廣義的，不但包括經濟的競爭，而且連這名詞的間接意義——種族和種族間、人民和人民間的生存競爭——也在內。（註二三）有了那些參加種族衝突者的生活史，

以及應用區域學的研究，纔能明瞭種族問題的性質。

在美國方面，主要的種族問題是有關黑人的。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註二四)主張如果黑人能够自己表示在工作上很有能力而且在道德上也很良善，那末大家對於黑人的偏見就會消釋了。杜包斯(W. E. B. DuBois)(註二五)請求白種人對於有色種人的偏見應該放棄，使黑人有一個良好的機會去表示自己的能力。美國南部的白種人宣稱有色種人應處於較白人低的地位。北部的人民則主張一切的問題是由南部白人對於有色種人的不平民化的態度上發生的，這樣，大家對於黑人的思潮就發生了衝突，但是並未組成一種共同的行爲。

種族問題的另一方面，就是從相互通利(hyphenated interests)的概念所表示的。因為需要全國更一致的精神，所以美國化運動就發揚起來了。雖則有些提倡美國化的人們運用了專斷的手段，但一般的意見都漸漸地認為要想使移民變更其忠順祖國的心理而為忠順於僑居的國家，最好的方法是在一切接觸——工業的、社會的和政治的——上，以同情的和平民化的態度對待。美國化、意大利化和俄羅斯化，都是同化作用的外貌，但同化是不能勉強的。它是一種不知不覺的。

社會過程，由『適宜』的社會刺激力所促成。使移民的生活情形、工作情形，以及發展個性的情形，都變為優美，那末他們在不知不覺中間就會發展新的忠順心了。

其他社會思想的趨向

公衆衛生運動已經很有力量了，因為大家相信只有大眾的和普遍的行動纔能消除許多疾病的緣故。例如肺癆就是因為微生物繁殖於易感受的和羸弱的有機體中而發生的疾病。肺癆與不衛生的住屋是有密切的關係。個人往往是無能為力的，所以現在有一種主張，認為公衆的行動可以毀滅結核菌的窩穴，使人民避免這種傳染病，對於沒有技巧的勞工和他的家庭提高其經濟的和教育的地位，也足以改善全國人民的健康程度。現代的社會思想贊同一種議論，就是主張醫生的真工作，在乎保持人民的康健而非待其患病後給以治療。社會技術論者極力提倡預防的藥和公衆衛生運動。

實用社會學另有一種重要的方面是由『公共的社會組織』(community organization)

(註二六)這名詞來代表。這種運動的觀念是起源由一般人民未能發展平民化的意識。公共的社會組織在某種意義上就指社會上為互相便利起見而團結起來。如果某一個社會組織了自有的娛樂設備，其重要任務有二：（一）它可以除去那種以謀利為目的和敗壞社會的商業化娛樂品，而代以有社會建設性的和低廉的民衆娛樂。（二）人民參加建立像公共娛樂場所等的公共事業時，他們就會發展一種合作的平民化的意識。勞工階級每天的工作時間已經縮短了，那末，利用閒餘時間的問題也就跟着發生起來。除了公共娛樂場所以外，公衆衛生運動、公共閱報、公共合作社，以及爭取必需的立法和打倒經濟專利的公共委員會等，也都被大家所注意。社會單位和社會服務的典型制度等名詞，都表示公共社會組織的概念的變化。這種概念的起源是要應付利用閒暇的問題，以謀實現平民化。

在真實的意義上，社會是包容着大量人民，他們在某一方面有着共同的了解和感覺。因此一個人的社會範圍，擴張到他的言語文字所能被人聽見和了解，以及發生反應的地方。

爲了同樣的理由，公共社會組織是應該被認爲『社會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和連續的部分，不

只是行政上的一種策略。」（註二七）公共社會組織是社會變遷的一方面，而且在大體上「它是不自覺地進行，或至少是沒有理智指導的」——「並非大眾所要考慮的事情，除非是團體失掉處理而引起瓦解，以致有效的和聯合的行動是辦不通的話。」（註二八）在美國的中國僑民、墨西哥僑民和日本僑民的公共組織，彼此互相比較或與美國的公共組織相較，是很足注意的。第一種是家族村落式的，第二種是沒有組織的和簡單的工人組織，第三種是封建專制式的。美國的公共組織是工業化和個人主義化的。（註二九）只是這種情形已經足以說明為什麼種族的、政治的和其他社會的誤會很容易發生，而且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出現的。

近年以來，實用社會學的領域中，社會的個別實行已經佔着很重要的地位。社會改進是關於改善全體民衆和提高整個集團的地位的各種方法，在另一方面，個別實行是督促個人改善自己的生活，使自己適應環境，以及改造自己的環境。社會的個別實行主張良好的社會改進只有根據親歷的經驗纔能知道個人在不完善的社會情形和個人的缺點中所需要的什麼，再來加以改進。對於個人的社會工作已經供給了許多重要的特殊事實，以爲設法使社會改善和進步的基礎。

它也反映出環境壓迫下的人類生活，以及描寫最殘酷的生活情形下的人類生活。

社會工作現在已在注重『人』。『人就是有社會地位的個人。人類踏進這世界時都是個人。後來獲到了社會地位而成為社會的人。』（註三〇）幫助旁人以求獲到社會地位，成為社會的人——這是社會工作的主要任務。

實用社會學就是社會研究的實際方法。它根據過去的社會經驗和現代的事實與趨向，為社會設計，以求促成社會的進步。它履行着社會導進論的需要。

過失的社會學（註三一）

『社會學現在已發生變化，好似心理學所發生的變化一樣，就是心理學從玄學一變而為實驗的科學，社會學是從社會哲學漸漸地變為社會科學，所以新社會學的旨趣已轉向於釐定實驗的觀點，區別各種調查的問題，以及發展一種研究的技術。』

『不但是犯罪行為，凡一切社會的問題，實際上包括整個的集團行為和社會生活之範圍，都

要受到社會學的描述和分析。對於個人的觀察，是注意於他與社會組織、家庭、隣居、團體和整個的社會之相互關係。他的行為之解釋，是以人類的願望和社會的態度、動態和不寧、親密性和地位、社會接觸和社會相互行為、以及衝突、通融、同化等名詞為標準。

『研究過失的個人這一點，又開展了另一個豐腴的領域。個別案件、個人文件和生命史等材料，現在都可以供給大家的分析研究，精神病學和心理學對於從個人行為的觀點上去研究犯罪問題，已經有了很有價值的貢獻，為社會學的研究開闢一條大道。精神病學的心理學的和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彼此並不衝突，而且是相互輔助的。社會學者將繼續地依賴於這其他幾種科學對於人類行為之發現，以求關於個人在心理上和性情上的差別之知識；而同時社會學者也應該從社會學方面找尋光明，以糾正社會組織中的個人。

『總之，這裏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所要討論的是人格的社會學而不是過失的社會學。罪犯先是一個人，第二層纔是一個罪犯。所以，我們研究他的時候，主要的是認他為人，然後再認他為違犯有組織的社會之法律之罪犯。了解和制裁犯罪的基本事實，是在認違法者為一個人，換

言之，是有一切人類共有的願望的個人和對於他在集團生活中的地位有相當的概念之個人。

『在社會學上，「個人」與「人」這兩個名詞之間，有着明顯的區別。研究個人和這有機體與其環境的相互行為，是屬於精神病學和心理學的領域的。研究人和人類彼此的社會相行動的結果，是屬於社會學的範圍以內。派克對於「人」曾作下述的定義：

「人是有地位的個人，我們生下來的時候都是個人，以後漸漸獲到了地位而變爲人了。地位是處於社會的位置，個人在他的本位的社會中，無論怎樣總有着相當的地位，在每一個集團中，其每一個分子的地位，是以他與其他各分子的關係爲斷。同樣，每一個小的集團在其所屬的大集團中，也有它的地位；而這地位是以它與這大集團中其他的小集團之關係爲斷。」

『地位的變換方式中，其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由行動所造成的，如住所的遷移。從某一個集團內遷移出來，以取得新的地位，是一種很普通的事實，一個「人」因爲在本鄉失敗、惡行和犯罪而失掉其所有的地位，也可以避到遠處去「改過」和「自新」。希蘭發覺在過失兒童的情形中，其家庭如果能遷地爲良，更變環境，是與增進感化的成功之速率相關聯的。

『照前面的定義，人是有地位的個人。那末，人格就可以認為許多決定個人在社會集團中的地位與任務之特質的總和。有些個人特質——例如他的軀幹、心理和性情——都足以切實地影響其社會地位。但是，主要的，他在集團中的位置，是取決於他本人的關係，例如他對於集團活動的參加、他的性格、他的行為準則和他的社會性。以下所有的敘述足供研究以個人特質為標準的人類行為之範疇。』

『個人行為準則的三種分類，就是客觀的或直接的，內觀的或間接的，以及精神病的或怪癖的。這種分類是本文作者所擬定的。這許多不同的行為方式，並不是人格，甚至也不是性情的隨時表演，或人類其他特質的表演。它們似乎是普通的一個名稱，個人行為準則，所含示的。換言之，就是人類自幼年和少年時期受社會關係的模型所薰陶的個人行為之特色。當然，心理上、性情上和意志上原有的區別，也幫助着決定個人行為準則的形式；但它的組成和固結是發生於社會的相互作用上的。』

『心理 (mentality)、感情 (affectionity)、性情 (temperament) 和意志 (will) 也不是不受

社會經驗的影響的。它們大都多少受教育和社會接觸之調劑的。但個人的行為準則，如自我中心主義、不穩定性和神祕性等，都形成於家庭和幼時遊伴中的社會相互作用。這些個人行為的準則，不像性情那樣可以照生物學的方式而互相傳遞。它們也不同社會形式或人生哲學一樣可以由模仿而形成的。個人對於社會的反應行為，是他在幼年和少年時受了社會勢力的作用之結果。人對於社會環境的固定的反應，是否為（一）直接，（二）間接，和（三）怪癖的三類中每一項，顯然是取決於他所擔任的職務，或在他早年的社會相互作用所迫他擔任的職務，在形成社會式的人格和接受某種人生哲學時，集團的影響是很有關係的。同時，個人對於他所採取的社會形式就是他所認為他的最熱切的願望之實現。』

『許多人在社會集團中的地位，依照最近的研究看來，是社會態度的問題：就是（一）個人對於本身職務的概念，而更為重要的是（二）他的組織、團體和社會中許多同伴對於這個個人的態度。』

『許多旁人們對於某一個人的態度是會變化的。這種變化有時是漸漸的，也有時是突然的。』

社會地位之取得和喪失，當然是個人很關心的。既然我們大家的生命都是從幼年開始，而且每一個人至少在某一特質上是較遜於同伴，所以遜人的意識是一種普遍的經驗，事事覺得遜人的習慣漸漸地形成無能力，而對於社會上就發生了特徵的價值。凡是有這種特質的人，就以較優的地位犧牲給團體了。愛特勒（Adler）在《神經系組織》（The Neurotic Constitution）一書中，曾分析心理上覺得及不上人家的情形之補充現象。

『上面已經說，個人的地位之研究，必須從社會態度、社會勢力和社會過程各方面着手。社會正常發展的有利情形，需要一個同類的社會，其中個人的願望都可以表現出來，如果對於這種願望加以絕對的遏止，勢必使它們在邪曲的形式之下表現出來。由常識的觀察中產生的社會工作之技術，時常欠於精細，不能適合於各種民俗和風化的情形，不能偵測微妙的個人態度，也不能了解個人願望的交流和變化。文藝對於人類各種各式的表示所給予的同情之內視，並不是從個別研究的原則的典型的訓練中產生的。這種表示在表面的變化上是綜錯複雜的，而在根本的簡單模式上又是十分相同的。社會事業的機關又時常「責備」個人或家庭雖有許多很好的「機會」

而拒絕合作。在一個被救濟機關認為有過很多機會去「自新的過失女子，而且她所得機會完全與它以前救濟的其他女子相同。但是，關係這案件的一個同情的分析，證明所謂的「好機會」沒有一個是真實使她有自新之機會。後面說到的一件事是十足表現着大家對於過失女子的「好」環境，其表面和實際是怎樣的差異。』

『最後有一件關於某種情形的事件是引起很多注意的，就是一個過失者的行為，被認為有地位的人所作的，而不是無地位的個人的。地位的突然喪失，或一個的「社會工作的失敗」，也許是人生最大的不幸事件，在完全失掉了地位以後，很少人能够復原，或「捲土重來」的。』

社會問題與社會距離（註三二）

『一切社會問題都可以用社會距離的原則來研究，而實用社會學也可以用減短社會距離的原理來加以考核，社會距離是討論着誤會的發生情形，所以也就是造成許多社會間的真實的因素。資本家反對工會人員的時候，就表現着社會距離的特質。一位富裕的地主斥着他的惡濁

和擁擠的房屋的住戶，也是表現着社會距離。凡調查任何不良情形，不論是客觀的或具體的，例如工資問題、罷工、種族的偏見、幼年者的過失等，都應具有社會距離的分析工作，纔能充分明瞭內容的情形。在實際上，對於社會距離的各方面之分析，時常可以闡明某種問題為什麼要存在的理由。

『在種族關係的問題上，社會距離漸漸變為遠了，大家就認為誤會和偏見加深。譬如，英吉利人、蘇格蘭人和威爾斯人將他們本族的人民，歸入親善範圍的尖頂，而對於東方的種族則歸入親善範圍的底層。同樣，東方的人民也看高東方人而看低諾特種族。學生遇到校中有糾紛的時候，就將自己一黨的學生們看得高，而將教員看得低。在任何一方面，社會距離總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社會距離與社會問題的關係，也可以從我們對於種族關係的研究中找到許多例子。種族的衝突，猶似其他各種衝突，是有衝突者之一方或兩方發生不利的反動之特徵。要了解這些不利的反動，就得了解這種問題所以存在之社會距離。

『（一）表示最大社會距離的反動之人們的生命史上所供給的材料，其最要和最大的一部分是傳統和公認的意見。一個人得到了他的朋友和他心目中認為有地位的旁人們之傳聞的

證據，就很足以發生社會距離；看到這一點，即可明白了。

『一個人供給第二次傳聞的證據時，往往猜像地加以附會，而這些證據時常完全變爲他個人親歷的情形一樣。傳統和陳見有三種趨勢足以發生錯誤：（一）原有的觀察是有不確實的可能的，（二）輾轉相傳時也會發生錯誤的，（三）個人有了特殊的偏見或經歷而對於以他人爲中心的事情也有作猜象的解釋之可能。就是因了上述這些關係，所以傳聞的證據是民刑法庭上都不承認的；但是在研究種族對抗的來源時，傳統與陳見都佔着重要的地位。

『我在小孩子的時候，有一天晚上，父親在食桌上講述土耳其人的種種殘暴行爲，就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而且從此就使我對於土耳其人發生仇視。

『另外有一次是我看見了父親的一本書上有張圖畫，畫着一個土耳其人正在揀選婦女以充其嬪妃。父親對於土耳其人之偏見的態度和這張圖畫，給了我深長的印象，永久不會忘掉。

『在學校裏讀地理的時候，我又知道了一些土耳其人對於婦女的態度，益使我深恨那種人民。在中學讀歷史的時候，我又看到十字軍的故事，而土耳其人的殘酷又給我很大的印象。後來，我

更讀到了土耳其人所有的各種慘殺的事件。

「我的父親、師長和讀物都是使我懷恨着土耳其人之主要原由。

『我對於土耳其人的一切不良的反應，並不是根據個人對他們的經歷。我甚至沒有認識這種人民的任何一位代表；也從未見到，不論是溫雅的或粗暴的土耳其人，除非猜象的。但是我有的是人家的傳說。我從報紙的標題上，關於半政治性質的陰謀之雜誌論文中，以及各種神祕的小說中，得到許多人家的傳說，在教堂裏面，我又聽到土耳其人對於傳教師的種種暴行。我也時常在宴會上、俱樂部內和街道中，聽到人家說土耳其人嫌惡我們的文化和理想。到了現在，我又聽到青年的土耳其人，雖是有理智的外表，而他的內心仍是莫名其妙的，和舊時的土耳其人一樣。』

『（二）幼年時期和青年時期所親自經歷的，不快之感的印象，是很多很多的。有時候就引起了恐懼，也有時候引起了憎惡，恐懼是比較的更厲害和重要的因素，但不論是恐懼或憎惡，總有一種意識的偶像，通常被認為有「可怕」的影響。在幼年時期對於這偶像有了經驗以後，就會給它多少永久的性格。』

『我們住居在西方中部的一個市鎮上，一天父親正在想法修葺房屋，他雇了一個黑人來工作。這個黑人大約是五十多歲的老頭兒，他孑然一身住在近郊的一所小屋中。我們小孩子都叫他「黑馬丁」，而我們的年齡較大的哥哥和姊姊在想哄我們的時候就利用他這名字。「你們不好的，那黑馬丁就來抓你了！」這句話，是對於我們小孩子比較普通的話要有力得多呢。

『這黑人馬丁在我們房屋的四周挖着一條很大的溝。當然，我們是小孩子脾氣，就站着看他工作。隔了一會兒，我們覺得厭倦了，就想找些新鮮花樣。這黑人一鏟一鏟將污泥拋起時，我們就拾了泥塊擲他。他當然是發怒了，並對我們說，要是給他捉到以後，一定要懲罰我們。當時我們就紛紛跑開，不再去驚擾他了。

『第二天他又來繼續工作，我們又去看他工作，忽然他出其不意地將我抓到溝裏去。我是害怕極了，就大聲叫起來，而其他的小孩都去報告我的父親。後來父親走來給我「救」了，我是十二分愉快，但不免仍有些害怕，從那天起，提到任何「黑人」的名字，就會使我害怕。這一次的事情，和關於黑人的一切教育，自然地使我嫌惡和恐怕他們。

『我在八歲的一年，有一天到山林中去散步，回家走過一所中國人的種菜園，有中國人在園內擯草梅。我走近這菜園的時候，那中國人突然躍起，想抓住我，我就拚力逃奔，而他在後面追着，口裏用中國話對我叫喊。結果，我跑到家中了，但從此以來，我總是害怕中國人。

『（三）不快的種族印象，也是在成年時期中所時常親歷到的。照例，在這方面仇視種族的態度是對於某種民族中少數人的經驗之普遍化。雖然大家也許承認這種經驗只是關於某種民族中那些沒有充分社會化的分子，或關於那些不能代表一般人的個人，但由此發生的憎惡很容易推及該民族的全體的。成年者的經驗與幼年時期的反應適成反比例。成年者偏重憎惡的情感，雖然有時也引起恐懼的。

『五十多年以來，英國人有句成語，就是「讓中國人的身體和靈魂都墮落罷。」英國雖是世界上最古和最大的基督教國家，但她用鴉片烟去燻毒中國人的身心，已經好幾十年了。目前這種害人的勾當，依然在盡力推行。這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一個信奉上帝，純粹的基督教國家，竟然在現世紀的今日販售這種性質的毒藥。我對於任何個人的欺詐總是不能忍耐的，那末對於這樣一個

國家就能忍耐了麼？優良的社會處罰毒物的販售者，同樣，優良的文明也應該抵制這樣的國家。

這裏首先應注意的，就是社會接觸不一定可以消除社會距離；今天的親密不能擔保明天也是同樣的親密。親密以後，也許會發生社會距離和反對的感情。這就是中立的社會距離與反對的社會距離之主要區別。前者用不到先有社會接觸和親密，而後者是先有這些的。

『種族仇視之前時常會有兩三種顯著的不良經驗，這事實是很有趣味的，因為這些經驗時常連帶發生有力的意識印象和強烈的反感，如恐懼、憎惡和反抗等。觸覺、嗅覺、目力和口味都會含有種族嫌惡的色彩的。『觸覺的嫌惡』（"touching phobia"）是特別有趣味的。它的生物學上之基礎，現在還得加以更精深的研究。

『在各種嫌惡的例子中，主要的反感並不是一種殘忍的意願，而只是想維持社會距離。一個人也許不一定與旁人表示同情。他不知道，或不管旁人在怎樣想。他甚至會自己想：「那些人的觀點與我不同，是多麼懦怯；他們應該受到淘汰呢。」這即是社會距離。換言之，就是派克（A. E. Park）所說的：「社會是隨着你喜歡有其他人的存在而產生的，即旁人的態度對於你是有相當的重要。」

社會距離在特殊意義上是測量你對於旁人的關係。」

『凡是個人關係存在的地方，「社會」和「距離」就連繫起來了。如果我對於旁人的態度漠不相關，或我完全無動於中，那末彼此之間，就有很大的社會距離。社會距離也可以用社會接觸來討論。如果沒有任何社會接觸發生，可以稱為完全的隔絕，而這方面的社會距離是無法取決的。如果彼此個人之間有了最簡單的見面，他們中間的距離也是很大的，但如果這種見面變為彼此情感、意見和觀念的交換以後，那末社會距離就縮短了很多。交接愈親密，社會距離愈短，但單是親密並不能保證社會距離會繼續短小，彼此憎惡和公然的交爭也許會隨着發生的。社會接觸的近密是可以產生好感，也可以產生惡感。其結果不是益趨融洽，就是起而反抗。』

『社會距離有二種：第一種是由於缺乏見解和交連。另一種是由於相識和親密的反躍，因為態度、意見和信仰之不同，在相識和親密中發現，而演為衝突。這種衝突是由於感覺和明瞭不同，或由於不知道旁人的知識、經驗和態度的來源所致。』

從社會距離方面觀察起來，個人是以其集團的特徵為特徵。他的特質與其集團的氣味沒有

什麼區分的。「一切中國人在我看起來都是相同的」——這是在社會距離上說。在另一方面，對於某一個人如果相識以後，就會發現他的個性，或他的特殊標記。但是這種個性足以產生良好的或不良的態度。親密可以引起憎惡，或由於厭倦的衝動之連續發生而引起倦怠。如果沒有了階級制度，在「某種人」看起來總是「失掉適當地位」，因此在這「某種人」方面就會引起各種不良的反響的。

『憐惜是表示一種社會接觸之矛盾的特性。在首先思考的時候，以爲憐惜存在的地方，社會距離就根本消滅了，但是這種考察是浮泛的。憐惜本身也就含示社會距離，只要自己設想爲一個被憐者就知道了。祇有假社會性的人纔需要被人憐惜。正常的人決不要人家來憐憐，事實上他還反對人家的憐憐，並反對對他表示憐憐的人。除非社會上有缺憾的人纔會接受人家的憐憐。

『社會距離在自成的貴族社會中是很自然地成立的。凡有權勢者總是深居簡出，並且維持各種禮儀，使其屬下不能和他接近親密，而作領袖者的腦中也不能對於屬下有所猜象。在另一方，民主主義是理論上想克制那些造成和維持社會距離之因素。

「社會距離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它與社會地位的關係。譬如日本的移民很想改善他們的社會地位，而愈是想得地位，愈是不能獲得地位。所以他們忿恨那些企願有穩定的社會制度之人民。但他們情願受人排斥，而不肯接受較劣的地位。從這情形中，我們說得到社會距離問題的一個總結。社會距離的意義即是較劣的社會地位，想從較低的地位之水平爬上來足以引起爭鬭和衝突。這方面的兩難情形，可以拿選擇較劣的地位和平一途或平等的地位和衝突一途這問題來代表着。

『英國抵制日本人的禁止移民律，在日本的知識分子解釋，完全是想貶抑日本人在世界上地位。他們沒有受到與其他民族同等地位的待遇，而是被置於較劣的地位。這種運用立法以增加社會距離是被認為貶降其地位——非自傲的民族所能忍受的情形。

『社會距離也是由於維持社會地位——即社會關係中的現狀——之結果。一個人如果對旁人好像神聖不可侵犯的樣，足以維持其與同儕的地位。一個人的生命上以失掉社會地位為最難忍受，因此就有維持社會距離的充分理由。

『地位是時常由於強力所產生；同樣地，社會距離也是由於強力、戰爭、欺騙和卑劣的宣傳方法所產生的。集團的地位往往也是同樣地造成的。而且一旦地位造成以後，任何集團或個人總是願意用武力去維持其地位，不論其所取得之地位是否出諸正當的手段。他們也時常努力於改善其地位，不過其所用的手段不完全是直接的。地位與社會距離的所以珍貴，一部分也許是因為都由爭奪而獲得的呢。

『某一黨派的青年總是拚命爭取其集團的地位，或甚至維持其不正當的社會距離。一旦達到了目的，他們就盡力的保守其地位，一直給勢力更大者奪掉了為止。但這是集團的不穩固的基礎，所以在較高標準的集團中，就可以看到用法律、傳統的成例、社會階級制度和風化等東西來保持其地位和社會距離。習用的倫理是為接受社會準則與不接受者之間維持其社會距離而成立，並且是前者所造成的。限制性的移民律也是提倡社會距離的。愛國主義或集團的忠順，也促進社會距離，而同時又足以消滅社會距離。祕密的集會也維持社會距離。司法的賄賂是對於法庭中的一位朋友消除社會距離，以及成立親密的關係。凡社會距離較短的地方，就會有大量的偏私行為。

發生。「幫忙」("Pull")的意義，就是說社會距離已經取消了。能够明瞭社會距離，即等於明瞭社會問題。』

討論要目

- (一) 實用社會學的意義。
- (二) 社會技術論的意義。
- (三) 英國對於處理貧窮問題所得到的主要教訓。
- (四) 應付貧窮的預防方法。
- (五) 地價增高與貧窮的關係。
- (六) 好華德對於犯罪問題的主張。
- (七) 柏卡略對於研究犯罪問題的貢獻。
- (八) 朗柏羅梭對於犯罪問題的主要學說。

(九) 社會對於罪犯應負的責任。

(一〇) 安密拉感化院的方法是糾正人格的步驟。

(一一) 奧斯本關於罪犯的學說。

(一二) 家庭與兒童犯過的關係。

(一三) 社會的不公道與過失態度的關係。

(一四) 道德的和宗教的理想與過失的關係。

(一五) 兒童救濟院與學校的關係，兒童救濟院與家庭的關係。

(一六) 實用社會學對於童工的態度。

(一七) 對於工業中女工的科學化態度。

(一八) 工業中三方管理法的價值。

(一九) 工業中消滅了營利主義的結果。

(二〇) 社會保險是勞工問題的解決辦法。

(111) 解決居住問題的主要困難。

(1111) 社會化的藥劑的意義。

(11111) 社會公共組織的性質。

(111111) 社會的個別實行的趨向。

(1111111) 社會的個別實行與社會改進的區別。

(11111111) 社會問題中的社會距離學說。

(111111111) 社會問題中『人』的任務。

附註

(註一) 華德著實用社會學(*Applies Sociology*)一九〇六年，金恩書局出版，第九頁，又第一〇頁。
(註二) 華德著純粹社會學(*Pure Sociology*)一九〇三年，金恩書局出版，第四三一頁。

(註三) 亨德生著現代的慈善方法(*Modern Methods of Charity*)一九〇四年，麥梅林書局出版。

(註四) 章勃著貧困的預防(*The Prevention of Destitution*)一九一一年，朗曼斯·格林(Longmans Green)出

版。

(註五) 地凡恩著痛苦與其原因(*Misery and Its Causes*)一九一三年，麥梅林書局出版；又地凡恩著救濟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Relief*)一九〇四年，麥梅林書局出版。

(註六) 華納(Amos G. Warner)著美國的慈善事業(*American Charities*)一九一九年，克洛惠公司(Crowell)出版，第三版。

(註七) 亨利喬治著進步與貧窮，一九一六年，道勃台·潘琪公司(Doubleday, Page)出版。

(註八) 吉爾林(John L. Gillin)著貧窮與依賴(*Poverty and Dependency*)一九二六年，紀元公司出版。這部書對於各種貧困的情形都加以明晰的討論。

(註九) 坤恩與曼西(Queen and Mann)合著社會病態學(*Social Pathology*)一九二五年，克洛惠公司出版。

(註一〇) 朗柏羅梭著犯罪與其原因和救濟(*Crime, Its Causes and Remedies*)一九一一年，立德爾·勃朗公司(Little, Brown)出版。

(註一一) 溫納斯與蘭恩合著刑罰與感化(*Punishment and Reformation*)一九一九年，克洛惠公司出版，第十章。

(註一二) 奧斯本著社會與監獄(*Society and Prison*)一九一六年，雅魯大學出版。

(註一三) 波力與柏斯塔合著刑罰，一九一六年，好脫公司出版。

(註一四) 曼谷爾特(G. B. Mangold)著兒童幸福的問題(*Problems of Child Welfare*)一九二四年，麥梅林書局出版。

(註一五)薩拉格曼(Ben M. Selekman)著《工人參與經營(Sharing Management With the Workers)》一九一四年，羅梭山琪學會(Russell Sage Foundation)出版。

(註一六)斯吉爾著《從資本主義時代到民主主義時代(Between Eras, From Capitalism to Democracy)》一九一三年，大學聯合印書局(Inter-Collegiate Press)出版。

(註一七)柏凡列琪(W. H. Beveridge)著《失業問題(Uneemployment)》一九一一年朗克斯·格林出版。

(註一八)好華德著《婚姻制度史(A History of Matrimonial Institution)》一九〇二年麥梅林書局出版。

(註一九)惠斯德麥克著《人類婚姻史(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一九〇二年麥梅林書局出版。

(註二〇)柯爾洪著《美國家庭的社會史(A Soc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amily)》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九年，克拉克公司(Clark)出版。

(註二一)伯山克著《家庭論(The Family)》一九一五年，麥梅林書局出版。

(註二二)古特賽著《家庭成為社會的和教育的制度史(A History of the Family as a Social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一九一五年，麥梅林書局出版。

(註二三)派克(Robert F. Park)著《種族關係的檢討(A Race Relations Survey)》，見美國實用社會學雜誌，第八卷，第一九七期。

(註二四)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著《奴隸階級的解放(Up From Slavery)》一九〇一年，道勃台·潘琪公司出版。

(註一五)杜包斯著：黑水(Darkwater)，一九二〇年，哈考公司(Harcourt, Brace & Howe)出版。

(註一六)斯達納(J. F. Steiner)著：社會公共組織(Community Organization)，一九二五年，紀元印書局出版；又哈德

(J. K. Hart)著：社會公共組織，一九二〇年，麥梅林書局出版。

(註一七)斯達納著：社會公共組織，一九二五年，紀元印書局出版，第三二七頁。

(註一八)斯達納著：社會公共組織，一九二五年，紀元印書局出版。

(註一九)鮑茄德斯著：新的社會研究(The New Social Research)，一九二六年，密勒公司(Jesse Ray Miller)出版。

第十章——『公共組織與輿論的分析』(Analyzing Community Organization & Opinion)

(註二〇)派克與布格斯(Burgess)合著：社會學概論(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一九二一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第五五頁。

(註二一)特許轉錄自布格斯著：過失的研究(The Study of the Delinquent as a Person)美國社會學雜誌，第一八卷。

(註二二)特許轉錄自鮑茄德斯著：新的社會研究，一九二六年，密勒公司出版。